

巴.心.友.而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0 期 2011 年 10 月 1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历史文献的历史局限——复卢法舜先生 (杜光)	2
《粮食的历史》导言、后记与节选 (淳世华)	7
《定西孤儿院纪事》节选——黑石头 (杨显惠)	29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刘岩)	37
反对权贵资产阶级 (伍石泉)	41
同学张鲁 (孙丹年)	44
军代表想为我这“右派”翻案 (王开泰)	50
我的两位右派老师 (佚名)	52

编者说明：本刊原意刊载交流文稿，因读者群中有许多是不会或不常上网的老人，应这些读者的要求，特地在正刊之外另办了一个网络文摘增刊，以选介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好文章。由于正刊来稿多为老人的苦难经历，有读者反映，希望题材多样，避免题材单一引起的阅读疲劳。现决定从第 8 期起，将网络文摘增刊合并到正刊中以拓宽题材，调剂阅读情绪，增强可读性、趣味性。希望大家本着“抢救记忆，追寻真相，交流信息，积累资料”的宗旨继续赐稿或推荐好文章(注明来源)。邮箱 :bsyy1957@Yahoo.cn

历史文献的历史局限——复卢法舜先生

杜光

按：今年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现将杜光先生2009年写的对《决议》的评述供大家参考。

卢法舜先生：

在这封信里，我准备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你来信说：“二，文中说：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中国人民刚取得的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向专制主义的泥坑。’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失误，1981年6月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您的评述是否同《决议》一致？”

我的评述确实同《决议》不一致。

《决议》的通过和发布，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指导各个领域的工作，曾经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虽然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解放思想，回顾反思，可是，思考的重点多集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上，比较显著地着重于感性方面，层次较浅；在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理论思想等深层次的问题上，多数还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与探讨。《决议》的内容，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个情况。

《决议》发布后的近三十年来，许多被长期掩盖尘封的历史真相得到披露，束缚人们头脑的传统意识形态不断被突破，人们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近六十年的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这就使《决议》的某些内容显得落后、过时，不合今天的时宜，现在还要同近三十年前的《决议》保持一致，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头脑禁锢起来，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我们就无法继续前进了。

下面，我就循着《决议》的思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一些简略的剖析。

（一）《决议》第一部分第3节谈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说“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决议》在这里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是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上的传统说法。但近几年学术界的研究却表明，当年中共的种种“右倾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到在国民党的挤压下节节退让，全部是共产国际强迫命令的结果。陈独秀曾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多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辖下的一个支部，他最后不得不屈从共产国际命令，接受并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当然，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在这个时期也提出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多只能说是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有关中国革命的大量档案解密公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决议》写进“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违背了历史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同它保持一致。

（二）《决议》还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传统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何方同志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里对这个问题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关于对军队的领导，何方引述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的记载：会议“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

（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八个月以后的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1936年12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组成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3人，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何方认为，“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在1937年8月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决定新的中央军委由11名委员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这时，离开遵义会议已经两年半了。

可见，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他只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并且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实现对红军作战行动的指挥。但是，在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为了树立和巩固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在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却掩盖事实真相，篡改历史，不但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而且说“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的《决议》只不过是重复了1945年《决议》的谎言罢了。

（三）《决议》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这也是对党史上的传统说法的继续。几十年来，在文件、书籍、课本、报刊上，都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周扬甚至曾经把它说成是现代中国继“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但近几年来颇有些专家根据确凿的历史材料，剖析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复原了它的真相。例如，何方在《党史笔记》里就明确指出：“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期间全党的学习是以一部伪造历史、粉饰罪恶的“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的，作为整风学习材料编进《整风文献》的，主要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章，却没有一篇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何方说：整风实际上是“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和延安的理论繁荣时期”。

整风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排除有可能对他的最高地位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他通过整风，发动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摧毁王明在党内的政治基础，肃清他对党员的影响，同时也削弱周恩来在党内的权威和影响（在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打倒“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对于大量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整风运动主要是扫除他们思想上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影响，建立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决议》说整风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所言不虚，因为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标——巩固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

（四）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一部分里，《决议》说：我们三十二年来的主要成就之四，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和估计，是能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当代史的关键，所以有必要多谈一些。

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是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决议》说“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为了支持这个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决议》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二条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第三条是为了避免农民两极分化，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条臆想的、虚构的理由之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建国初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有些资本家苛待工人，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有些工人对工资福利的要求过高，不服管理，任意旷工，等等，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方针，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矛盾，更没有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更是毛泽东的异想天开。他曾经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

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所谓“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意味着走完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两条前后衔接的道路，而不是同时并存、可供选择的道路。这是因为，选择什么道路取决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更何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按照我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是小农生产力，都远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在这样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决不会出现的”。

然而，《决议》却说是“基本上实现了生产数据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列宁曾经说：“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后来人们就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定义为生产数据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样来定义社会主义当然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什么是按劳分配？由于列宁斯大林把国有制当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是全民所有制，把他们实行的等级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结果形成了长达八九十年的世界性的理论谬误。

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叫它公有制也好，社会所有制也好，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应该是“在协作和对……生产数据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有关的论述里，马克思特别强调“联合”和“个人”，如：“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在自由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实现个人所有权”。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指的是一种联合占有和个人所有相统一、相结合的所有制：一方面，生产数据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共同使用，任何人都无权处置；另一方面，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一个劳动者都占有一份属于个人的所有权。在这样的企业里，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资产者、有产者。个人所有权是他们成为企业主人的经济基础，他们因此可以享有参与经营、管理、监督、分配等等各项应有尽有的权利。这样的经济制度，才可以说是生产数据公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有一位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在《求实》杂志的副牌《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专门批判我写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就是你提出问题的这篇）。他认为，资本主义承认每个人都可以占有生产数据的私有制，所以，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数据所有权，就是“私有化”，“也就是全面实行私有制”。这位把延安整风时学到的一些斯大林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老党员，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私有化”，是“全面实行私有制”。真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可惜，在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这样看问题的，还大有人在。

把等级工资制看做是按劳分配，是经济理论上的又一个重大谬误。其实要捅破这层谬误的窗户纸并不复杂。第一，在生产关系里，工资制体现的是交换关系——资本家在市场上用金钱购买劳动力，实现货币和劳动力的交换；按劳分配体现的是分配关系，反映的是利润怎样分配的问题。第二，工资制实现在生产过程之前，资本家只有买到了劳动力，即支付一定的工资，才有可能开始生产（即使工资是在生产之后才支付，也是按照生产之前的契约履行的）；按劳分配却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后，经过生产，有了产品，再拿到市场上交换货币，扣除成本，才有可供分配的利润。第三，工资是生产劳动之因，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分配却是果，不论按照什么方式分配，都是作为生产的果实来分配的。第四，劳动力被购买后，工资被计入成本，成为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分配的却是利润，资本和利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五，工资是一个定数，是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之前就约定了的；可供分配的利润却是一个变量，产品的价格高低，有无销路，销售渠道是否畅通，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分配。

由此可见，工资制和按劳分配，完全是两回事，怎么可以把它们等同起来呢？

那么，什么是按劳分配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列宁把这种分配方式概括为按劳分配。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是劳动者通过劳动“给予社会的一切”？

在生产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包含着两部分价值：成本和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在市场得到实现后，首先要扣除成本，补偿生产过程消耗掉的物力人力，包括生产资料、原料和生产者及其家人的必要的消费，这部分成本扣除后的产品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还要扣除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用费，最后在生产者之间按照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也就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地进行分配。所以，按劳分配的含义，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按照生产者的劳动贡献，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根据以上分析，不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按劳分配，我们都远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决议》却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显然是不妥当的。联系到近几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叙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把国家所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等级工资制看做是按劳分配，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可见，我国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出现的生产关系，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当时我们根本不具备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既然社会主义改造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农的个人所有制，而社会主义所有制又没有产生的条件，那么，取代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就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了，那就是对生产数据的全面垄断。与经济上的全面垄断相适应，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主义的大倒退，专制主义的大复辟。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向专制主义的泥坑”的根据。

（五）《决议》说：“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近几年揭露的一些事实表明，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是一起大冤案。高岗 1952 年奉调进北京，是毛泽东为了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影响而设置的一着妙棋。他让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统揽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分周恩来的权；他不止一次地向高岗表露对刘少奇的不满，甚至让高岗亲自到沈阳去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在二十年代被捕后的表现。高岗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要借他来打击刘少奇，便到处活动，拉拢陈云、邓小平等，企图把刘少奇推倒，取而代之。不料这些异常的活动，反而引起了高层人物的警觉与怀疑，他们为了自保，纷纷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反映。这就迫使毛泽东权衡利弊，作出抉择。由于高岗在党内的根子没有刘、周深，基础没有刘、周厚，毛泽东如果继续扶高抑刘，不但不能达到打击刘少奇、削弱周恩来的目标，反而不利于自己的最高权威。“高饶联盟”就是在这样一种舍车保帅的形势下出现的。高岗在受批判期间，再三恳求毛泽东面谈，澄清问题，毛泽东却拒绝见他，还把他开除出党，使他绝望自杀。

综观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固然有高岗个人的野心和图谋，但归根结底，他是毛泽东的帝王权术的牺牲品，阴谋的主角不是高饶，而是毛泽东。所以，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对他们应该有一个公道的、适当的结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

（六）《决议》还谈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一节里，再次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提了出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 1957 年 2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内部传达后，6 月 19 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全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

造。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历史教训和反思，我却发现它是一个否定法治、为人治服务的理论，它的意义和作用，主要在于巩固专制制度的独裁统治。这个理论完全抹杀了宪法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是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准绳。不论是哪一类人，都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抛开法律，把公民分为敌人和人民两类，而怎样划分，又没有定性定量的标准。在毛泽东的报告里没有提到而在发表时加进去的所谓区分人民和敌人的六条标准，都是可以任凭统治者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这就为极权统治的独裁者提供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理论依据。在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人民、敌人之分，只有守法、违法之别。法律有一套完整的规程和细则，有罪无罪，判罪程序，量刑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整个运作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只有法律。而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正确处理的主体却不是法律，而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起指导作用的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指示。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创造，而是维护和巩固以党代法、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的理论工具。这个理论的危害，可以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严重后果里得到充分的证明。每次政治运动，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更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把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结果。我却认为，撇开法律而听任最高领导人的“无法无天”来“正确处理”，就不可能正确处理。只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才有可能避免“正确处理”所造成的灾难。

（七）《决议》关于 1957 年反右运动的记述，更令人愤慨。它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这段叙述里，《决议》把反右运动描述为“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是完全违背事实、粉饰错误的托词。事实表明，当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55 万（一说 300 多万）知识分子中，没有哪一个人怀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没有哪一条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却都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与“地富反坏”一起，沦落为“新社会”的贱民阶级，不但自己受尽煎熬凌辱，连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在入学、就业、婚姻、参军等问题上，都备受歧视。请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吗？毛泽东炮制的这个“阳谋”，以言治罪，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既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又违背了社会道德和人类良知。它不但扼杀了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且败坏了全社会的道德风尚，造成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相互戒备、人人自危的恶劣风气。这是一场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可是，当权者至今仍然坚守“完全正确和必要”、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底线，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前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居然在年初明令文化界和出版界，不许发表或出版有关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文章书籍。这个事实说明，《决议》关于反右的荒谬表述，至今仍然是阻碍被迫害者讨取公道的鸿沟，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同《决议》保持一致吗？

（八）此外，像说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建国后 32 年的成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伟大的抗美援朝”，“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大力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等等，都是应该重新认识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说了。《决议》中还有一些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还有毛泽东的功过，毛泽东思想的是非，都是有待澄清的重要问题，很需要通过全党全民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恰如其分的认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也有责任发表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不过，这封信已经写得够长了，暂且先放下，等有机会时再阐述我的见解。

当然，《决议》也有写得比较好的，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那部分。大概因为起草和参加讨论的人，都受过文革的迫害，感受较为深刻，所以反思也比较好。虽然其中还有些不很妥当的提法，如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革“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等等，都还有待商榷。但总的说来，这部分还是写得比较好的。

此外，有几处经验教训也写得很好，如：“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党内存在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党的各级组织同其它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我很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同《决议》保持一致。可惜的是，现在的党政机关，从上到下，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些经验教训，并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呢？

总的说来，《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它产生和发布的那个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的、有益的作用。但由于那时离文化大革命不久，许多历史真相还处于被歪曲、被掩盖的状态，很多理论认识上的问题还受着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所以，不论是对历史的叙述还是对理论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这种时代和观念的局限性，是任何人、任何文献都难以避免的。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也是十分自然的。我前面所说的一些观点中，有些看法目前可能还没有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写出来供你参考。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你提的另外几个问题，以后再另行答复。

2009-06-10

【网友推荐】

《粮食的历史》导言、后记与节选

淳世华

按：《粮食的历史》，封面书名前后各有一行字：“一部实证的三年饥荒的地方专题史”。“彭水·1959—1961”。作者淳世华，重庆市彭水县人，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系高级教师。退休后从事地方专题史研究和写作。此书由香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如果说杨继绳的《墓碑》是对中国三年大饥荒的全景式记叙，那么此书就是对当年川东一个县的三年大饥荒的实录。作为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的作者，在此书中却完全没有采用文学描写和修饰的手法，只是冷峻地列举档案资料和口述记忆史料来记录历史。那些惊心动魄的实例，往往会让人不忍卒读却又不得不读下去……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特选发此书的导言、后记、各章提要和第十三章，供读者了解。

导言

一

这是一部实证的三年（1959—1961）饥荒的地方专题史。

除公共食堂、大规模流行的肿干病各设专章外，全书以时间为线索推进，在每一时间截面，以粮食问题为导引展开叙述。

二

第一、二章是对1953年开始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和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历史叙述。三年饥荒的

发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粮食统购统销实际上是一种准“余粮收集制”，在取缔粮食自由贸易后，政府统一购销价格，农民除上交公粮外，还必须将80—90%的余粮交售给国家，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被剥离了产品销售直至消费的自主权，虽然在压低农民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却严重压抑和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年（1957年），彭水的粮食生产仍然处于低水平，连续几年的高征购，农村粮食储备大大减少，除了当年食用，多数农户无储备粮，部分农户尚需国家返销供应才能度过荒月。这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533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35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8.42%。当年全县发电97860度，产煤4万吨，财政收入22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万元（全县人均22.67元）。但此时，在毛泽东持续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后，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拉开了大跃进的一角帷幕。随即，彭水提出“苦战五年（提前七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争取从1958年起，五年内把落后的彭水建设成为繁荣、富强、康乐的新山区”的奋斗目标。谁曾料到，这一启程便踏上了灾难丛生之路。

第二章聚焦求证1958年彭水的粮食产量。不管制定了多么高的经济指标，也不管喊出了多么响亮的口号，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57年，在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1.58%的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产值在二分之一以上，当时，农业经济就是粮食经济，如果粮食出现问题，一系列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不幸，问题出现了。一是粮食产量出现了与官方数字比较的巨大的亏空，一个至多就是连续农业年之间的增产年演变为增长数倍的特大丰收年。二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出现了巨量的浪费。因为大炼钢铁，青壮劳力抽空，秋收赖于老少，大量秋粮作物霉烂，加上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和公共食堂在一段时间内不计定量，社员除了在食堂吃饭，粮食全归集体，这种机制对粮食的消耗超乎常态。结果，增产不增收，非但不增收，而且因为巨量的浪费，连一般增产年的局面也维持不了。入冬后，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在全县流行，这一年全县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58年终成为三年饥荒的前奏。

三

彭水公社所有制时期，起于全县实现公社化的1958年9月上旬，基本止于1959年3月下旬（以3月21日—29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为标志），大致七个月的时间。第三、四章便叙述彭水公社所有制时期的史实。第三章主述在建立公社所有制过程中的“一平二调”，第四章主述农业生产上反科学的瞎指挥。

几乎在一夜之间，农村的物权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公共积累，农户的自留地、宅基地、林地、牲畜等财产都成为公社的资产构成公社一级的所有制，同时，实行了半供给、半工资制的含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的分配制度，建立了公共食堂。公社所有制严重剥夺了社员家庭物权，也拆除了原农业合作社集体之间的物权边界。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单位的地位，家庭经济组织作用的破坏，使最基础的应对饥荒的自救能力弱化甚至丧失。物权没有边界，对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是超常的。集中办食堂，大办工业，劳力、物资统一调配，驱使农民奔走迁徙，大量房屋被拆毁，成片森林遭砍伐，无数古木毁于一旦。几个月“一平二调”“共产风”的肆虐，不仅使农村最基础的经济层面被严重抽空坍塌，丧失了活力，而且因为过度滥用民力，农民的体质体能受到严重损害，元气大伤，那以后，每况愈下，难以恢复。

就粮食生产方面，在迅速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和“三三制”的方针指导下，大幅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少种”寄希望于并不现实的“高产”（彭水“双十万”运动的指标即为十万亩，亩产万斤），而反科学的过度深耕和密植等技术措施，使正常的粮食产量都难以实现，在双重夹击下，1959年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公社所有制七个月，时间虽然短，但破坏性极大。这种破坏是基础性的，而且涉及各个方面。它的破坏因子在三年饥荒中持续发生作用，农民一步一步深陷饥荒的泥淖。

四

从 1959 年 4 月全县“分级分权”建立管区所有制，到 1961 年 6 月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实行三粮（口粮、种子、征购）就队落实，口粮分配到户，公共食堂解散，管区所有制走向瓦解，两年多时间。这是饥荒继续发展，并在 1961 年春达到最困难程度的时期。

这段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由第五、六章；第七、八、九、十章；第十一章主述。

一、1959 年上半年农村部分政策调整的缓冲和下半年批判右倾倒退的反弹。

二、1960 年春，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处于不完全的状态。

三、1960 年冬，贯彻“紧急指示信”本意于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的调整滑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的路径。到 1961 年春，三年饥荒达到最困难程度。

进入 1959 年，全国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国家粮食征购完不成，屡屡发生暴力抗征事件，而粮食销售却大增。全国各地时起闹粮风潮，比较统购统销还严重。毛泽东认为，粮食紧张的原因不在粮食本身，实质是所有制问题，是因为模糊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引起了农民的反抗，所以解决农村问题（或者说粮食问题），应从所有制入手。鉴于此，上半年，中央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分级分权，将所有制从公社一级下放到管区一级，并确认“生产队部分所有制”。稍后，又放宽了包括划分自留地的多项有利于社员家庭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对于公共食堂，中央也指示要体现参加食堂的自愿的精神，办法可以灵活多样。不过，与此同时，中央告诫全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不是方向性的转变，而是前进中的政策调整，因此，要特别警惕有人乘机否定我们的路线和方向，右倾倒退。人民公社是一个发展问题，不存在方向问题。调整政策，是为了更快地前进。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是遥不可及，毛泽东乐观地估计了这个过程的时间。

在四川，四川省委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止于管区所有制，而对包括划分自留地在内的多项有利于社员家庭经济发展的政策拒不执行。一不划自留地，二严格限制社员私有和私养毛猪，把政策能给予的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空间压缩到最大限度，这是四川农民的不幸。

即使如此，在农村政策调整的缓冲期，夏收前后，彭水藉着消灭空白土地的机会，放宽了集体和私人增种的限制，集体和私人增种在全县发生。晚秋作物的增种，虽然季节紧促，全县发展也不平衡，但使部分社员家庭增加了收成，使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多少得到一些抵减。

但很快便遭到严厉的清算。清算不仅是对上半年缓冲政策的反弹，而是殃及全局。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被打断，全党全国直至农村基层开展“反右倾”运动，结果不仅部分开启和放宽的农村政策关闭和收紧，而且导致了 1959 年下半年特别是 1960 年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饥荒不可避免地走向深重，农民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后果的最大承担者。

庐山会议转向和会后的“反右倾”似乎证明了四川省委 1959 年上半年贯彻中央“分级分权”、“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适当发展社员家庭经济等政策的一系列消减作法的先见性。在中央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中，四川省委踌躇满志，表现了站在前列的政治立场。四川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倾，对所谓 1959 年夏季的邪气、歪风的反弹达到“矫枉过正”的力度，农村划类划到了每一位社员，发动阶级斗争，反瞒产私分，检举、揭发直到追逼、抄家。一些家庭自存的所有食物，能搜到的都不能幸免，举凡一小块肉、几个鸡蛋、几两食盐，直到一坛泡菜，为的是彻底消灭小私有、小自由，巩固公共食堂。

1960 年的春天，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1 月，中央上海会议批准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钢 1840 万吨，粮 6000 亿斤。会议提出今后八年内人民公社从基本队（管区）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2 月，四川省委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大会报告的题目是《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 1960 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粮食计划产量 800 亿斤，五年内从基本队（管区）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2 月，彭水县委发出指示，在省委“三个一”之外，增加第四个一，即“一个时间”。粮食计划产量保证 6.2 亿斤，争取 6.7 亿斤。同时，彭水

县委《关于积极发展公社经济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创造条件的初步意见》出台，要求五年内公社一级经济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达到 60%。

是时，四川省委对农民吃粮标准的安排是：农事较少期间，争取每人每天吃四、五两（十六进制，下同——笔者注）粮食，三月后保证吃半斤。彭水全县 2696 个食堂，每人每天半斤及半斤以下的 1846 个，占食堂总数的 68.47%。

这就是 1960 年持续大跃进中的农民的吃粮水平。

四川省委的“三个一”，彭水的“四个一”，强求农事山上山下统一时间，统一技术规格，腊月种包谷，育红苕，正月下谷种，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花样翻新。同时，正是春播时节，新一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狂热刮起。

太多的折腾，使我们失去了 1960 年的春天。

到 1960 年夏收前，粮食危机进一步加深，许多公共食堂难以为继，有的已经断粮断炊解散。对此，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全国推行贵州省委“口粮由基本核算单位（管区）定期发给食堂（生产队）”以巩固公共食堂的做法。4 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财贸书记会议，专议对粮食的全面管理。李先念给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基本核算单位统一掌握粮食，能够进一步加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有利于逐步向公社所有制过渡。中央指示：把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统统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保存和管理，任何动支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是一个先进的制度。中央对管区掌握粮食寄予厚望，企图以此化解粮食矛盾，巩固公共食堂，从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其实，管区所有制退守到对粮食的保存和管理的底线，说明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区所有制，已经残缺不全。但这种残缺不全的所有制却在现实中对粮食生产和消费发生着极大的破坏作用。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统一口粮标准，统一拨付的制度严重损害了生产和消费单位——生产队的利益。由于粮食存量的普遍低少，各生产队食堂之间口粮的不均状况，绝大多数不是丰裕和匮乏的差别，而是同处于不能免于饥饿的低标准水平的多寡的差别。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社员、生产队、管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凸显，加上对预期的不可把握，加剧了生产队和社员的“反制”行为。生产队瞒产私分，更直接地是趁收获时眼前有一点现粮，不要计划和标准，求得暂时的饱腹，一些干部正是在这种非正常和非公开的失序的运作中，获得了比正常状态下更多的贪污多占的机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在粮食成熟期间，盗窃集体种植的粮食的行为大量发生，延续于收获的全过程，甚至前移到青熟期，部分生产队到粮食收获时，达到了无粮可收的程度。

1960 年，粮食产量继续走低。据以后审定的统计数字，全国比 1959 年减产 15.58%，四川在 1959 年比上一年减产 29.54%的基础上，1960 年又比 1959 年减产 15.32%，而彭水的这一组数字则分别为 44.86%和 31.81%。但在当时，各级虽然没有回避对粮食形势紧张的认识，却没有放弃 1960 年是一个增产年的估计。

粮食危机是粮食产量连年大幅下降，导致供给不足造成的。匪夷所思的是，从上到下，却忽视这样简单的事实，不是从生产的根本上着手，而是一轮又一轮的反瞒产私分。尤其是到 1960 年夏收季节，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后，反瞒产私分更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七、八月开展的“三反”运动，四川省委要求“应把清算粮食和猪支的账目作为‘三反’的主要内容”。在彭水，“三反”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即为反瞒产私分，解决粮食问题。到八月后，春天折腾的恶果终现。秋粮生产形势危急，一些地方出现罕见的秋荒。秋收时节，彭水县委即发出大抓代食品的指示。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提出一系列措施。在四川省，立足于 1960 年是一个小幅增产年的认识，四川省委认为群众生活安排关键在于管区能否掌握粮食，是一个掌握程度的问题。要求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反右倾，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上。一定要把隐瞒的粮食全部挖出来，并由管区统一掌握起来。这样，本是粮食产量出现了与官方估计比较的巨大亏空引发的危机，又同样由官方层层组织的反瞒产私分来消弭，这真是残酷的悖论。

反瞒产私分也是一种政治，它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象是富裕农民及其利益的代表人。无论是七、八月的“三反”运动，还是九、十月反右倾，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都充满火药味，先是“七查”、“五比”、“五定”、“五补”，后是小有变化的“一查二定三补”，一直延续到年底。上压下挤，逼人说假话，谎言重复一遍又一遍，被当成农民的口粮。三年饥荒到了1960年下半年已经是非常时期。这时的农民，不仅没有热情搞生产，而且身体也羸弱至不能正常承担农业劳动的地步。这时的农民最需要的是开放一点有限的空间。但是，事实相反，坚持管区统一掌握粮食，坚持公共食堂，坚持“反右倾”成为主政者的选择。宁可要农民的命，也不要政治的不正确。

11月，转机出现。中央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下发全国，集中而系统地重申曾经做过规定的一系列纠“左”的政策，其中包括不能用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计划的恢复农村集市等内容。史载：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紧急指示信”，毛泽东2日收到信稿，3日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并附言“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3日下午，“紧急指示信”发往全国。中央和毛泽东寄扭转危局的希望于“紧急指示信”的紧迫心情可见。

但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转向和会后“反右倾”中断纠“左”进程一样，历史在一年之间又发生了重演。毛泽东在了解到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后，认为是封建势力篡权，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提出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特别是其中的三类社，要再来一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补课，还有肃清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补课。四川省委的敌情意识更强烈，省委第一书记说：贯彻“紧急指示信”纠“左”，突然间来一个整三类社，给反革命一个打击，挖掉二、三万个坏分子，斗争完全必要。整风整社运动从1960年12月开始，到1961年5月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基本完成，历时五个多月。集中优势兵力，解决三类社，打击阶级敌人，夺回领导权，成为破解危局的关键。这样，在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无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最困难时期，疏离了“紧急指示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偏离了全力投入挽救已经急速走向崩溃的农村经济的路径，耽误了救灾救命的时间，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官方档案资料显示，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彭水全县人口死亡31564人，占三年饥荒死亡人口的44.55%；龙洋公社黄秧坪八个生产队同期死亡人口占三年饥荒死亡人口的65.29%，根据留存的人口死亡登记的原始记录统计，大部死于冬春两季。

两次转机演变为更深的危机，盖出于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的思想牵引着全党上下的视线，转移着全党上下的着力点。庐山会议，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出现，视为“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庐山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后，又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党全国，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使本不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更加形同虚设。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毛泽东在完成这一过程后，踏上了权力专制的不归路，而贴近这不归路的第一场政治灾难便是三年饥荒。

五

从1961年6月，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公共食堂陆续解散，管区所有制基本空转，到1962年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高级社），在此期间，农村政策处于调整的准备阶段。这是饥荒仍在继续，但容易被忽略的一段时期。本书的第十四、十五章即对这段时期作历史的叙述。

公共食堂解散时，大多数地方已经收完吃完，食堂无存粮，社员空身离去。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难以维系，生产队一级在政策调整时期，徘徊观望，无所适从。夏收后，全县空地陡然增加，在消灭荒地的紧迫形势面前，彭水县委对逐渐兴起的私人增种取妥协态度。在集体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个体的自救膨胀起来。但大量的、分散的私人增种，在自发的状态下，农民家庭之间的差别和不平衡显现出来。

经过两年多饥荒，农村各个家庭在人口健康状况、劳动力、生产资料占有等方面发生不同变化。

人口健康（无病或少病）、劳动力保存较好、具备基本的生产资料（种子、肥料、农具等）的家庭处于优势地位，增种的规模较大，绩效明显。农村各级干部家庭是这类家庭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家庭结构尚未解体，人口和劳动力保存较好一类家庭也能随势跟进。而另外一类家庭，增种则困难重重，有的则完全没有增种的能力。这些家庭或者家庭结构解体，或者人口健康状况恶劣，或者劳动力受到严重损害，或者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等，构成了这段特殊时期的弱势人群的主体。到 1961 年春，全县共有孤儿 2505 人；五保户 1939 户，2696 人，户均 1.39 人——多数家庭是孤老；困难户 13732 户，45269 人；同期尚有肿干病员 1—1.2 万人；他们大致占到全县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在自救中，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且容易受到各种伤害，这段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他们之中。

六

本书第十二章专述三年饥荒时期的主要流行疾病——肿干病。第十三章专述公共食堂。1959 年春，彭水一些地方已陆续发生水肿病人，自此，肿干病即流行于全县各地，缠身于农民，多次出现发病高峰。1962 年夏收后，规模性流行才逐渐收尾，全县重点转入对晚期肿干病治疗。但直至 1963 年七、八月，全县尚有数十名两年以上病史的肿干病人。

三年饥荒的一幅幅悲惨的场景中，遍及乡村的肿干病人和肿干病房很难令人忘记，那简直就是农民身心痛苦的渊藪。持续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低标准供给，大量采食野生植物，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肿干病。三年饥荒中，大量农民都是在经历了肿干病痛苦的折磨后，走向了死亡。所以，本书特设专章叙述。

三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公共食堂是这样一个平台：它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的载体，是最具集体化特征的生活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物诸多矛盾，直至人性善恶的纠结地。它承载的太多，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也太多。

公共食堂制度的设置，产生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领导和管理者——各级基层干部、食堂管理员和为食堂服务的其它人员直延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一部分是接受服务的一般成员。在伙食团统一掌握口粮，统一在食堂吃饭，口粮标准使人人不能免于饥饿的情况下，多吃多占成为前者“贪污和浪费”的主要内容。这不是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诠释的，也不是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能解决的，在这里，政治诉求已经退居其后。但是，这种多吃多占是残酷的：同样处于不能免于饥饿的低标准水平，现在，其中的一部分人——即使是少数人为求得一饱或求得高一些的口粮标准，就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在不能免于饥饿的水平线上继续往下坠落，例如每日 8 两，只吃到 7 两、6 两甚至更少。这里，两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发生明显的差异。后者受到侵犯的是生存权、生命权。“反制”行为大量地发生于后一部分人。笔者采访的大多数农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如果做不到“多吃多占”，便采用各种方法盗窃集体粮食，而暴力伤害的违法乱纪行为大量发生反盗窃行动中，这后一部分人成为受伤害的主体，不少农民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制度的设置，即使实行管区所有制，既然没有公共食堂，粮食就必然要分配到人到户，不管按劳和按需的比例多少，不管管区将如何调配生产队之间的收入（以示管区所有制的地位），一家一户安排生活的格局将维持下来，家庭副业——种植蔬菜、饲养牲畜等将顺理存在，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单位将发挥家庭自救能力。而且，由于没有公共食堂，以暴力伤害为主的大量违法乱纪行为将缺少一个平台。

三年饥荒中的公共食堂制度实在是一个残酷的制度。

七

关于 1959—1961 年粮食生产遭遇危机引发饥荒的主因，在分析了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公社规模过大的“习惯的假说”后，林毅夫认为“更有可能从 1958 年秋集体化的性质从重复性博弈变为一次性博弈中得到解释”。林用 1958 年集体化的自愿运动结束后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家庭责任承包制兴起前农业生产率既低于集体化前单个家庭生产时期的水平，也低于 1952—1958 年

自愿集体化运动时期所达到的水平的结果证明他的“一次性博弈论”。

林认为在“一次性博弈”的激励结构中，不可避免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结果，它贯穿于整个强制性时期。1958年集体化的自愿运动结束后，农村经历的公社、管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阶段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林毅夫从表现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切入，可谓把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

但是，虽同属强制性时期，与1962年后的农业经济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困苦的历史场景比较，1959—1961年三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断面，它特殊在于发生于经济建设和和平年代巨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在关注贯穿强制性时期的连续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要关注这个特殊时期中若干歧异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所发生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很难全面深入地解析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非常惨重的灾难。

农村集体化强制性时期肇始阶段的公社和管区所有制较1962年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规模更大。公社所有制虽然仅存在几个月的时期，但因为它不仅严重地剥夺了个体物权，而且也拆除了原农业合作社集体之间的物权边界，其对农村基础的经济层面破坏十分严重。管区是以高级社时期的联社为基础组成的。1958年上半年，成都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加快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速度。彭水的高级社在此期间基本上以原来的建制村组成联社，但各分社（即高级社）仍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社是松散型组织，不是经济实体。成立人民公社后，联社成为管理区（简称管区）。管区下辖若干生产队（原高级社）一般200户左右规模。分级分权后，公社所有下放到原本就不是经济核算单位的联社（管区）一级，松散型的组织成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经验和物资的准备。管区所有制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产队与管区之间生产和分配分离的矛盾。管区所有制退守到对粮食的保存和管理的底线后，管区和生产队两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生产队和社员的“反制”，使管区经济核算功能徒具虚名，生产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比较1962年后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显然，肇始阶段的公社和管区所有制对生产的阻滞和破坏要严重得多。

公共食堂不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但却是集结各方面利益的最重要的制度。解析三年饥荒，断不能轻视它，其对民生的损害前已述及。

三年饥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大跃进”。自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一直延续到1960年。伴随着“大跃进”的是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它们对农业生产的损害，本书有详尽的记录。它们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空前绝后，而且是民族的和国家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竟然集体性的低水平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一种耻辱。

还有高征购。高征购发现于事后，因为征购指标出自当年虚高的产粮指标。各地产粮指标的虚高程度不一，导致高征购的程度不一。三年饥荒中，按以后核定的实际的产粮指标计算，高征购十分严重。1959、1960年，全国征购分别占总产的39.7%、35.6%，四川省1959年征购竟然占总产的48.67%。彭水1959、1960年征购都在4000万斤（原粮）以上，以后多年都未达到此水平。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按当年虚高的产粮指标高征购，高减产后高征购，一减一增，农民在勉力完成征购后，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而正是在粮食极端困难的1959、1960年，国家出口了以数百万吨计的粮食，大大地降低了国家粮食储备水平，一段时间，连京、津、沪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

上述种种，都离不开政治的参与。前述的三年饥荒中的两次转机演变为更深的危机，都证明了政治参与的强势。

在农村，这种政治参与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言必所称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阶级划分是阶级斗争的基础条件。中共通过区别“依靠”、“团结”、“打击”等的不同层面，授以不同阶级的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连带经济利益）的方式，在以“大多数”原则的格局解决中共政权在农村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用形而上的政治建构割裂乡村社会，而这恰好为中共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运作提供了主动权。在三年饥荒中，无论是对地、富的

一轮又一轮的打击，或是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阶级斗争都得到活生生的运用。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是发动和组织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三年饥荒中，每年的冬季到翌年的春季，都开展了对农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之中，各类运动不断。国家的各种制度、政策安排，都要通过运动进行宣教，旨在扫除障碍，统一思想，贯彻执行。运动中，除维持既有的阶级划分的基本格局外，照例要对成年的社会成员分类排队，即使对依靠力量的贫下中农也要划出左、中、右。每次运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他们走在前面，带动群众。在运动中，组织上不但要相信和依靠积极分子，而且一场运动结束后，还要加以表扬和任用，“论功行赏”。而被组织发现、培养并任用的积极分子为了表现忠诚和出成绩，他们的斗争性强于一般群众，自土改以来，农村每次运动的暴力斗争大多出在他们手上。即使出了问题，组织仍要坚持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除非其忠诚发生了变化，否则很少让他们受到处分和承担责任。这一政策运行的结果，使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的地位日重，主要经过政治运动选拔和培养各级领导骨干的比重不断加大。这也是中央的极“左”路线在向下中非但得不到弱化，反而是愈向下愈放大的趋势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群众中划左、中、右，还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这种每次政治运动对社会成员的整合的机制，都会触及到人的具体利益，即使不明政治为何物，但争取利益最大化，却是人的普遍心理。最终，机会主义的生存手段成为几乎所有人的选择。表面上的统一意志，内里的一般散沙，社会的能量被碎化。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运作的手段，使农民基于求生存和发展的力量遭到分化瓦解，被内耗、衰减，而深陷被动，而国家的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通过阶级斗争强行开路，得以施行。农民的“反制”，大多只停留在消极怠工，偷窃拿摸等分散的非组织的被动行为上。在这种情势下，国家与农民的博弈既不公平，也不均势，是一种偏移的互动，以国家名义的意志终不可抗拒。农民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国家的政治清算也只有在其自身遭到危机甚至是存亡的危机时才能进行。

八

三年饥荒是一场政治灾难，这是《粮食的历史》的结论。

1959—1961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称谓已经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变化，但笔者更愿意用“三年饥荒”的称谓表述。

后记

2005年春，我决定撰写一部三年（1959—1961）饥荒的地方专题史。

我在彭水、涪陵区、四川省档案馆和其它有关部门档案馆（室）查阅了对外开放的三年饥荒时期及相关年份的大量档案资料，仅在彭水档案馆就查阅了上千卷。在对丰富的档案资料阅读、分类整理后，我进行了乡村调查，陆续到过县内二十多个乡，七十多个村，调查采访了数百名亲历者、当事人，除对文档记录中重要史实、典型例证进行验证外，还获得了丰富的口述和图像资料。在撰写过程中，我仍不时根据需要在各级各类档案馆查阅档案和下乡采访调查，尽力避免似是而非的瑕疵。

本书是一部实证记录的专题的地方史，全书史料均采自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凡所采用的史料，除少数文字上的梳理外，尽量保持原貌，对基本史实内容（情节、数据等）均无变动。例如对彭水1959—1961年人口变动的情况，即使有数种估算、分析，但我采用的完全是官方的档案文本，并据此作出分析。

我希望它是一部经得起检验的三年饥荒的地方专题史，一部信史。

在调阅档案和下乡采访中，我得到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工作人员和众多受访者（他们中多数是老农民）及乡村干部的积极配合。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不少朋友给予我关心、鼓励和帮助。这里，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很难说我能不能坚持完成这项工作。

《粮食的历史》每章提要

第一章：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实现国家工业化，

使粮食统购统销成为国家政策。这种在和平年代用政治强力建立起来的准“余粮收集制”剥离了生产者产品贸易直至消费的自主权，农民内生的种粮积极性受到平抑，在粮食生产和粮食蓄备仍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彭水农民捏着不大的粮袋子走进了“大跃进”的1958年。

第二章：以常识论，在种植面积、耕作技术、农业气候等主要条件接近的连续农业年之间，粮食产量的升降幅度应呈平稳态势。但1958年却创造了“大跃进”的神话，将至多就是一个连续农业年之间的平常的增产年演变为增长数倍的特大丰收年。政治家需要神话的存在，使1958年终至成为走向三年饥荒的前奏。

第三章：1958年公社化后，短短半年时间，一方面，“一平二调”实行生产资料和大部生活资料向公社所有制的迅速转变；另一方面，“一平二调”又主导了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分配制度的改革。“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粮食供给制被宣传是共产主义因素的体现。但是，随后的事实是，因为粮食供给的不足，公共食堂普遍地实行低标准定量，粮食供给制改变为“包两头，中间评定伙食基本分”的办法，农民一脚踏进了饥荒。

第四章：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整社运动奠定了1959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基础。围绕粮食生产的高指标，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大幅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少种”寄希望于并不现实的“高产”。而实际上，反科学的过度深耕和密植等技术措施连正常的粮食产量都难以实现。“左”的愈向下愈膨胀的张力，主导了1959年的开局，不幸的开局为1959年埋下了隐患。

第五章：基于粮食问题是表象，实质是所有制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应从所有制入手的认识，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大队一级，“分级分权”后，随之，又决定对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给予一定限度放宽。但在四川，不划自留地，多方限制社员私养毛猪，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到最大限度。1959年开局埋下的隐患渐次出现：小春减产，耕地大量荒芜，大春作物播种面积不足，普遍长势不好，病虫害严重……

第六章：1959年秋后反右倾大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完成了纠正右倾倒退——收回（部分地方划出的）自留地、蔬菜地、饲料地，大部收回私养毛猪，取消小自由、小私有后，最终演变为一场粮食问题上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从上到下不能面对现实，宁“左”勿右，浮夸虚报，掩盖粮食危机，使农村形势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

第七章：“反右倾”运动导致1960年更大规模的“跃进”。四川省委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到彭水加上了“一个时间”。强求农事上山山下统一时间，统一技术规格，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花样翻新。同时，正是春播时节，新一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狂热刮起。太多的折腾，使我们失去了1960年的春天。

第八章：从中央到地方推行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企图以此化解粮食矛盾，巩固公共食堂，但现实是管区统一掌握粮食不仅实施困难，而且因为产品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损害了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对预期的不可把握，加剧了农民的消极作为。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已是末路。在这场博弈中，没有赢家。

第九章：“三反”中，粮食问题不能回避，各种矛盾纠结于此，部分农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在粮食问题上最为普遍而且严重。在“三反”中，既解决干部的违法乱纪问题，又通过反瞒产私分解决粮食危机，而问题在于，没有粮食增产增收的前提，在反右倾的高压下，反瞒产私分的结果只能导致掩盖矛盾，加深危机。

第十章：1960年秋收后，从上到下虽然没有回避对粮食形势紧张的认识，但却没有放弃1960年粮食生产是一个增产年的估计。在四川，贯彻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反瞒产成为重头戏。彭水在现实困境面前，坚持反右倾，从上到下层层反瞒产，追、逼、查、搜直至社员家庭。其实，粮食的危机就在粮食本身，就在粮食出现了与官方估计比较的巨大的亏空。

第十一章：《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寄予了中央和毛泽东迅速扭转形势的希望。但是，形势的发展留下的是遗憾：着力于生产关系的政策调整滑向了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复辟，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的路径。四川，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转机演变为危机：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形势继续恶化，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发生，是三年饥荒中最困难时期。

第十二章：肿干病是三年饥荒时期主要的流行疾病。本因长期粮食和副食品的低标准供给而营养不良造成，但一段时间，上下对此讳莫如深，而当面对现实时，处于最低谷的地方和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医疗方面人员、技术、设备的落后，却难以应对这样大规模的流行疾病。农民成为残酷的死亡痛苦的最大承担者。

第十三章：到1961年春，公共食堂已是沉疴缠身。从《农业60条》的“三月草案”到“六月草案”，公共食堂的退却，经过调查试点，步步为营，从容审慎。在这散与不散的政治决策之间，农民生活艰难，非正常死亡随时发生。

第十四章：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农村形势呈现复杂的局面。在农村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准备期间，本已是低效率的集体生产严重失序，农民自由经济活动的间隙增大，但农民家庭的自为自救能力强弱不一，在缺乏社会救助和经历了两年多严酷的饥荒后，差异凸显。同时，“右倾倒退”的个体经济不被容忍，并被视为一切恶果的归因，反右倾倒退仍为必然选择。

这是饥荒仍在继续但容易被忽略的一段时期。

第十五章：进入1962年，度过春荒，夏收和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成为三年饥荒的转机。农村体制退到生产队止步。即使这种“统一经营，集中劳动，评工计分，按工分分配”的集体化经营模式并非全体农民的自愿选择，但在国家政治的强制性面前，农民愿望的实现还需要等待和付出代价。

《粮食的历史》第十三章（节选）

（本章提要略）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这是形势所迫。

1961年，国家进入第三个困难年头。农业、轻工业急速下滑，国民经济持续恶化，已接近于崩溃。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危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1960年苦苦支撑的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铁路运输，进入1961年也不可遏止地跌落下来。

危机集中在粮食问题上。以后，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讲：“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同一次会议上，陈云讲：“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中央和毛泽东再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10章60条，简称《农业60条》。《农业60条》于3月23日通过，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后来称为“三月草案”。《农业60条》“三月草案”在八届七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4月5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解决得比较到位的是社队规模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例如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

但是，“三月草案”中，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定在生产大队（管区）一级，仍然规定分配上供给占三，工资占七的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仍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些规定，维持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仍在保护“共产主义因素”，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其中，首当其要的是公共食堂制度。

先在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应当解散。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饿死人的原因，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而是“五风”造成。^①

4月10日，胡乔木在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坦陈，“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②

5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到邯郸调查的情况，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能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③

其间，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省一级）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向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是大势已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再次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究修订《农业60条》和继续整顿“五风”的问题。6月15日，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业60条》（草案）的通知。《农业60条》的“六月草案”比较“三月草案”有了新的突破——

1、关于公共食堂。将原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当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2、关于供给制。供给占三，工资占七的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被否定，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自此，人民公社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

3、关于山林问题。明确了山林的所有权：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实行计划采伐。“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和路旁的林木，分别划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

在上述突破中，“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三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公共食堂是这样一个平台：它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的载体，是最具集体化特征的生活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的一项最重要制度；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物诸多矛盾，直至人性善恶的纠结地。它承载的太多，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也太多。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农村公共食堂的出现本就严重先天不足。

彭水第一个农民集体食堂成立于城郊乡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时间，1958年7月24日。

7月24日前，从6月中旬开始，第六生产队办起了农忙食堂。农活紧张时，中午集体吃饭，由社员按人头凑粮食，专人煮饭，送到地头。这样，虽也提高了一些劳动效率，但社员早晚还得回家煮饭和饲养牲畜，分户凑粮食也需要时间，而且往往为粮种和粮质的差别闹意见。因此，农忙食堂集体开伙并不多。

其时，彭水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以实现农纲为目标，彭水县委提出在五年内把彭水建成繁荣、富强、康乐的新山区。到1962年，也就是第五年，粮食产量达到6.94亿斤，亩产820斤，人均1550斤。很快，彭水实现农纲的步子提速。7月23日，县委提出当年（1958年）达到原定五年完成的目标。在批转县委驻城南工作组《关于严密劳动组织，迎接大丰收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批转语中，县委指出，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发展到居民点集中，办常年食堂，符合多快好省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苦战两年，明年实现每人万斤粮千元钱，即可大大改变山区面貌。现在两家挤住一间破草屋的辛苦生活，是为了后年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社会主义生活。

工作组的《报告》称，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秋收在即，是一个史无前例动人心弦的大丰收，水稻估产比上年增产 50%，包谷 70%，红苕栽插面积比上年翻六番。而计划中的小春播种面积将由 1958 年占耕地面积的 51.9% 扩大到 93.3%，土地深耕到 1.5 尺，密植由上年每亩下种十多斤，增加到二十多斤，三十多斤，以至于百多斤。季节要求提前半月，一月。这样的用工量，这样短的时间，要求有高度严密的军事化的劳动组织，战斗化的行动。农忙食堂已经不适应全面的大跃进，要解决全面大跃进和劳力不足的矛盾，就要集中居住，集体生活。

7 月 23 日，第六生产队用一天的时间集中，全队除富裕农民唐顺芝、彭惠珍不愿搬家外，其余各户把粮食、肉、油等副食，牲畜及日常生活用品搬迁到队里农户居住相对集中的湾里，有七户社员让出 12 间半房屋做人员居住、食堂、仓库、猪牛圈栏之用。7 月 24 日，第六生产队常年集体食堂开伙。全队安排炊事员 3 人，养猪 4 人，放牛 3 人，占全队 44 个劳动力的 22.7%。集中以后，自留地自觉取消了，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掌握、统一使用，社员只管生产劳动，吃饭，休息。粮食、附产物等一律不再进行分配，由生产队统一掌握使用，年终决算由现金归补。集体使用社员房屋，采用租赁方式，猪一律折价入社。家具社员需要，社上用处不大的仍归社员所有；社员用处不大，社上需要的折价入社。伙食吃多少算多少，以户为单位，每月算账，年终决算。大菜（肉、豆腐、豆芽等）吃多少算多少，多吃多算；小菜（豇豆、南瓜、茄子等）按三岁以上人口均摊，三岁以下无偿供给。

工作组的《报告》认为，常年集体食堂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个体生活所具有的自私观念，树立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从前不积极出工的社员再也没有借口了。这种高度严密的、军事化的劳动组织，对完成大跃进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报告》同时也反映了部分社员的顾虑：集中居住，生活不方便。吃好吃孬，吃软吃硬，人来客往，饲养牲畜，自家才好计划安排。富裕农民更说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上屋搬下屋，要赔三斗谷”，留恋一家一户的生活。^④

此时，农村集体食堂已在全国各地兴起，像河南、安徽等省更是走在了前面。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集体化发展的重大创举。在四川，《四川日报》对农村集体食堂做了多篇典型报导。

距彭水第一个农村集体食堂产生不到二十天，至 8 月 14 日，全县已建立农民集体食堂 3567 个，参加农户 57738 户，占全县农户 70.14%，每个食堂平均 16.8 户。其中，常年性集体食堂 2526 个，占全县集体食堂的 70.81%。汉葭区一夜之间办起 491 个，下岩西乡一夜参加食堂 1544 户，拿出粮食 3 万多斤，余家社社员王登志把四年多的陈粮 1180 斤交给食堂。靛水中心社年近八十的杨珍秀一听办集体食堂就将自己的大锅、桌子等家具，还有舍不得吃的 20 斤大米给食堂，红旗三社彭光定把 500 斤腊肉也交给了社上。按彭水县委 8 月 16 日《关于农民集体食堂的情况通报》描述：许多农民把古老的“灶王爷”推垮了，把自己的锅、盆、碗、桌都搬进食堂，一心归食堂了。

《关于农民集体食堂的情况通报》总结了兴办集体食堂的经验：政治挂帅，作好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参加集体食堂是对农民千百年来个体生活习惯的重大变革，农民会有许多顾虑，特别是富裕农民的顾虑和抵触更大。珍加乡一村二社食堂 136 户，拥护和积极参加的 44.8%，态度不明朗、随大流的 37.6%，抵触不通的 17.6% 共 24 户全是富裕农民。他们有的东躲西藏，分散粮食，怕食堂不长，以后挨饿。有的闭门杀鸡吃，把大小鸡鸭菜蔬拿到集市卖掉。有的痛哭流涕，说“瘸的把不瘸的也扯瘸了”，“以后做来够吃就行了”。针对种种思想问题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集体食堂的优越性，处理好具体问题。对地富反坏分子的造谣破坏活动则要予以揭发和打击。二是坚持自愿原则，贯彻阶级路线。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他们坚决、积极、爱社如家、顾虑少，思想觉悟高。食堂的管理员应该让贫农、下中农中群众公认的大公无私的社员和干部担任。三是加强食堂管理，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依靠群众办好食堂。食堂内要设文化教员、宣传员、读报员、卫生员。定期公布账目，接受群众监督。四是做好各类物资的投资工作。食堂要公开挂出粮、菜、柴、油、盐等的牌价，规定交纳数量，发动社员积极投资。粮食多，多投资，这是最大的光荣。要把富裕农民存有的部分粮食动员出来。低

平地区粮食成熟可发扬协作精神支持半山以上未成熟地区。木柴按定量交食堂。食堂按一家一桌编席，吃多少记多少，半月一次结账，公布账目，让社员知道投资了多少，吃了多少，相抵后归补多少。五是食堂规模不宜过大，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提倡将分散的农户向居民点集中。食堂对小孩、老人、病人、产妇等在生活上要进行必要的照顾，允许这些人自开伙食。⑤

一周以后，至8月21日，全县农村集体食堂又有新的变化，总计3712个，参加农户62874户，占全县农户78.72%，每个食堂平均16.93户。其中常年食堂2244个，占全县农村集体食堂60.45%，比较一周前减少282个。岩东乡两天之内组织61个食堂，社员投资粮食214000斤，空出房屋36栋108间交集体使用。

8月21日，县委决定秋收之后，不再分配粮食及附产物，社员的应分粮食发给粮票，凭票吃饭，年终决算由现金归补。县委指出，要大力进行农村集体食堂的巩固工作。由于一些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思想不稳定，加之管理工作跟不上，甚至有混乱的现象，造成部分食堂的不巩固，松松散散。不少食堂蔬菜供应紧张，应迅速建立蔬菜基地，专人种植蔬菜，并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现有的蔬菜，积极向食堂投资。⑥

谁也未曾料到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在全县兴起的由社员投资，自付盈亏（吃饭要算账）的农村集体食堂仅仅才一、两个月的时间，尚立足未稳，就由体现人民公社“供给制”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替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但公共食堂产生不到一年，便危机凸显，解散和划小食堂的呼声四起，何去何从，发生不同意见。庐山会议一锤定音，公共食堂成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敏感问题。但进入1960年，公共食堂危机陷得更深。中央和毛泽东不甘心人民公社的这一重要制度中途而废，又一次以贵州省委整顿公共食堂的报告为发端，在全国大力整顿公共食堂，特别是实施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措施，强力维系公共食堂。尽管公共食堂弊端丛生，危害深重，早已怨声载道，但纠正困难。

1961年上半年，正是三年饥荒最困难时期。连续两年粮食大减产，粮食供给紧张。农民大多时间处于饥饿之中，体质体能严重下降，羸弱不堪，疾病大规模流行。四、五月，全县肿干病人数最高达到21500人，加上妇女子宫脱垂、闭经及各类杂病患者，发病人数在五万左右。此时，粮食供给出现新的危机局面：大量公共食堂已无自存粮，反瞒产私分无济于事，国家返销供应成为农民口粮的主要来源。

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农村集体存社员口粮7027200斤，上年底全县农业人口315700人，按此计算，人均口粮为22.25斤。到2月，全县依靠国家供应口粮的管区386个，占管区总数80.75%。3月，县委书记向地委汇报：自一月开始，全县粮食家底，除上述的集体存粮外，国家供应农村口粮12144700斤，加上集体存粮外，人均59斤，按每人每日保证半斤贸易粮计算（即算大账），可以吃到5月13日。但具体到不同的区、社，由于自存粮的不平衡（一部分管区，生产队自秋收后即依靠国家供应粮过日子，一部分管区、生产队粮食产量存在虚空数），则不能一概而论。全县478个管区，366个管区安排到四月底，36个管区安排到五月底。有442个管区需要补充供应，补充供应面92.46%。⑦

4月1日，彭水县委向涪陵地委提交了要求增加粮食供应指标和减少粮食外调任务的正式报告。报告称，通过检查，部分地区生活安排不好，春荒露头，无供应指标，口粮不能落实。主要是过去有部分地区说了假话，库存家底不清，这次露了马脚。下岩西公社何家管区年底安排生活时，支部书记赵永祥说假话，虚报晚秋作物产量，自报自有粮可安排到四月底，但到3月18日管区粮食已尽，管区缺粮近万斤。沙坪公社新华管区自报口粮可以吃到小春产新，而到二月中旬就发生断粮停伙。至三月底，全县集存社员口粮179万斤，国家供应粮除已供应的指标外，尚余2769400斤，两项合计4559400斤，平均每人约14斤，算大账只能吃到4月28日。全县安排到五月中旬，需粮食811万斤。除集体存粮和已有供应指标，加上各区、社挖出的695600斤外，尚需地委增加供应指标2684400斤。清仓

盘点全县国库，至3月31日，库存979.88万斤。在夏收前，县必须供给的社员和非农业人口口粮，病号补助粮、工业用粮等为1077.16万斤，与国库粮食相抵后，尚差97.28万斤。今年上半年粮食外调任务650万斤，地委前已批准减为500万斤，实际完成321万斤，尚差179万斤，现已无力完成。报请减免后，全县还有近100万斤的缺口。⑧

这是彭水县委向上级党委要求增拨粮食供应指标和同时减少粮食外调任务的第一份正式报告，在此之前，没有过这样的报告。报告敞了全县粮食（包括国库存粮）的底，确是岌岌可危。

4月26日，郁山区向县委报告，全区粮食库存与供应指标相抵，差32万斤，而且，这也是从大账来看。报告称，“各公社的供应指标和4月20日止的粮点粮食库存数比较，大多数公社问题严重，如稍有忽视，就有停伙断炊的危险”——报告在特别指出这一问题后，列表显示了各公社的情况：除联湖公社外，其它八个公社与供应指标相抵后，库存都是负数，即是说，郁山区大多数公社都需要从外地调粮。⑨

由于农村口粮主要依靠国家返销供应，而国家粮食库存点在全县分布又不均衡，粮食内调面广、量大、任务重。有的调进粮食的公社，管区距离粮食调出地，往返一、二百里甚至更远，主要靠人力运输，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粮食的损耗。而且，在调度上也存在诸多困难，各公社、管区因信息流通不畅，情况不明，调度也不及时，造成局部地区断粮。有的调出粮地区，希望少调或不调，运粮者徒劳往返时有发生。

这种粮食供给的局面，更加深了公共食堂的危机。

“四关”难过，大多数社员吃不足半斤贸易粮。除了国家返销供应外，集体和社员个人粮源枯竭，面对如此低的粮食供给标准，而且严重缺乏蔬菜和副食品，在几乎人人都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存的威胁时，各种形式的“多吃多占”在少数人中普遍存在。人人都吃足标准，没有损耗是不可能的。靛水公社张家坝管区社员张家碧说：每天半斤粮，炭筛筛了米筛筛，米筛筛了格筛筛，格筛筛了面筛筛，落到我们嘴里只得一半了。只是经过两年多的饥荒，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累积造成的人的体质体能的更加衰弱，“四关”难过现象造成损害更深。

在一些地方，食堂用粮出现了新的办法：干部出差、开会要补助，犁土、担水、砍柴要加饭，干重活吃双份，甚至用生粮熟饭作小包工的报酬，而这些粮食都要从社员人平半斤贸易粮中抽取。弱者愈弱。

3月到4月，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检查了全县部分公共食堂，发现问题严重——

大同公社5357人，到二月底有口粮126825斤（国家供应粮97825斤，管区自有14000斤，公社储备粮15000斤），人均23.5斤，按人均每日半斤贸易粮安排，可吃到四月中旬，接小春差近两月口粮。该社大河管区自2月17日就无口粮拨付食堂。除一生产队有1500斤增种粮食自行解决没有停伙停炊外，其余三个食堂停伙停炊，各家各户自行上山挖蕨根渡日。有劳力的家庭，勉强能挖一天吃一天。受病户日子难过。社员苏远成一家七口人，三个劳动力，自秋收后一家人多数生病，被逼无奈，苏远成带病上山挖根，挖几锄就昏倒了，全家生活只有靠别人淀过粉后丢掉的蕨根渣过日子，生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像这样的家庭，共有15户。二生产队179人，有严重肿干病的26人，面瘦如猴，走路偏偏倒倒的11人。惊蛰都逼近了，管区90%的耕地还未动铧。三生产队的三支耕牛，由于饲养员整天上山挖蕨根，解决自己口粮，长天不给水草，活活冻饿而死。⑩

靛水公社板栗管区，295人，3个食堂。社员每天只能吃到5—6两贸易粮，集体没有蔬菜、代食品，每天每餐清水稀饭。96个劳力每天出工40多人，肿干病员48人。出工的劳力每天干活3—5小时。驻队干部张国华同管区干部开小锅小灶，一个半月不给粮票。吃牛肉，社员吃几两，他们吃几斤。88人到黄家坝运粮，往返七天，每人每天补助口粮2.5斤，运回后每人都差秤。大队会计李世泽运80斤，补助17.5斤，差秤9.5斤，还在粮食里掺杂发水。管区运粮7000多斤，补助加差秤减少1800斤，是120人一月的口粮。（注11）

高隆公社场上食堂过年前后，两个多月未吃过菜，食堂每天净光煮一干一稀两餐饭，有时连盐开

水都没有。1月15日到23日，八天未吃盐。管理员代启超40天就盗窃社员口粮、饲养粮248斤。煮饭时，他先就一顿回堂饭。他在秤盘上加两个小铁环，一斤饭少2两，多出的饭，干部和炊事员分吃。据查，食堂菜种还有青菜半斤，四季豆5斤，莴笋4两，皮菜1.5斤，海椒半斤。南瓜、豇豆、茄子绝种。这个公社的岩脚食堂少数社员运粮私分247斤，食堂管理员上任三天盗走粮食63斤。干部吃头道净粮食饭，掺水掺代食品的饭社员吃。腊月二十七在队长家里查出大米10.7斤，包谷10斤多，豆子6斤，小麦5斤，熟饭2斤多。这个食堂从冬月到过年死亡32人，几乎天天埋人。原有毛猪32支，现有3支（其中1支病重）。早熟作物到3月3日只有4亩洋芋。春耕春种生产未动。（注12）

青平公社11个管区72个食堂，9个管区62个食堂人平计划不到半斤贸易粮，其中7个管区48个食堂人平计划6两贸易粮。经过运输、加工、干部、炊管四道关后，社员能吃到口里的不过4—5两。太平管区五生产队一级劳力每顿只有6两4钱熟饭。多数食堂缺菜，喝白开水的有10个食堂。集体的蔬菜地吃菜连根拔。目前，连普通的牛皮菜、白菜也绝了种。对9个管区6111人的统计，杂病不计，肿干病有416人。新民管区690人，肿干病员138人。太平管区五生产队40个劳力，肿干病员28人，严重的15人，已倒床不起的10人。（注13）

城郊公社亭子管区八食堂，在人平只有半斤贸易粮的情况下，规定运粮、进城办事（例如买盐）、耕地等实行口粮补助，再加上干部和炊管人员多吃多占，使大部分社员只能吃不到四两的贸易粮。该食堂69人，最近一个多月，死亡9人（全是劳动力），14个肿干病号大多为男劳力，以致有人死后，本队抬丧上山的人也没有，管区只得从其它队调人帮助。该队毛猪全部死光。（注14）

大厂公社的食堂大多是一锅一灶，有桌无凳，社员不在食堂吃饭，锣响打饭回家。更主要的是，由于遭到种种剋扣，社员实际只能吃到4—5两粮食。一是运输偷粮无人管。四管区团结食堂5人运口粮来回半天的路程，用了三天时间，吃粮26斤。二是干部多吃多占。三管区大队长罗永奇（公社派驻的外大队干部）1—3月，除多吃外，还退生粮46斤12两，等于三个社员一月的口粮。四管区兰木食堂，管理员吴应高给自己亲家筒德和称饭，一顿多称4斤14两，而老实社员赵顺珍一家3斤饭就少称了1斤。三是口粮代奖励。五管区四个食堂，犁土一亩称饭1斤，多犁一分加饭2两。社员秦左碧挖蕨根62斤，称饭1.5斤，社员李德秀体弱多病交7斤，称饭3两。四管区团结生产队少数社员给粮站运粮差数，粮站就扣食堂的供应粮，食堂只得顿顿吃混汤稀饭。绝大多数食堂集体没有种菜，四管区团结食堂78人，半亩蔬菜地，看不到菜。社员反映：这样子怎么活得下去。清明已近，全社五个管区有两个管区开始管理小春，早熟作物（荞子、洋芋）一亩未种，去年已种了1500亩包谷，今年一亩未动。原有耕牛138头，现在只有78头。团结生产队原有23头牛，现只剩下7头。（注15）

在公共食堂如此情势下，对于大多数普遍农民，生存危机迫使他们大量采食野生植物。而在不到一年前，即使仍是迫于生存危机，采食野生植物却被视为“闹粮”。社员半夜三更在家煮食野菜，如被查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发现，轻则提（或砸）锅掀灶，重则扣饭、批判斗争，采食野生植物处于非法的不公开状态。大河公社四管区社员王吉玉邀约几人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被以“组织集团上山挖草根、割树皮，公开闹粮”的名目受到批判斗争。1960年上半年整顿公共食堂时期，彭水县人民法院以“闹粮罪”结案63起，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其中的部分案件在多项案由中，个人或组织“煽动”（判决书用语——笔者注）社员采食野生植物，被列为案由之一。

在农民采食野生植物“合法”开禁之前，从上到下宣传和推行的是粮食增量法。

1959年9月底，四川省委向全省转发《温江地委批转邛崃、蒲江县委关于推广几种粮食增量办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省委认为“报告很好”。笔者现在给“粮食增量法”定义：在同一品种粮食相同量的条件下，做成的熟品，比较常用的方法，增量一倍至数倍的新的方法。例如，据《报告》介绍，同一种大米，经过煮、蒸、晒、碾四道工艺流程加工，比较常用的方法，做出的熟品饭要增量90.4%，将近一倍。三开一蒸法，一斤大米可以做出四斤熟品饭。谷粉加工法，一百斤谷子磨粉95斤，可抵95斤大米吃，比较传统加工法，增量25斤左右。到1960年夏收时，四川省委生活福利委员会向全省转发南充地委《关于革新小春粮食吃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新版本的粮食增量

法。《报告》称，小麦、豌豆、胡豆做成的熟品可达三十多种。做法革新的主要工艺流程，都免不了磨、泡、烫、蒸、煮，大多需要发酵。优点是，增量，节约粮食，一般比旧法要增量一倍以上，最多可增量五、六倍。例如三鲜面，混合面粉加蔬菜，先将混合面粉合匀发酵一小时，做成面块，加蔬菜合搅即成，这样一斤面可供四人吃，比旧吃法增量一倍半。小春革新吃法的品种多，味道好，耐饿，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得了照顾，不愁嚼不动整粒粮了。（注 16）

彭水县科委、科研所向全县推介了大米煮饭增量法，增量更大。泡米增量法一斤米可出 5—6 斤香软可口的干饭。炒米蒸饭法一斤米可出 5.9 斤，最高可达 7.2 斤。生米蒸饭一斤米可出 7 斤干饭。烫米蒸饭法一斤米可出 8.2 斤干饭。增量其实十分简单，例如生米煮饭法，生米不淘、不泡、不炒，按定量入碗上甑。蒸前按 1 两米 6 两开水，用大火蒸煮即成——一加六等于七两干饭。在同一期《彭水科技简报》还推介了食油增量法。一曰科学油。一定量的普通水烧开后，把同量的食用油加入水中，加盖煮 20 分钟，待水、油发出相撞声即可，油量增 40%，与一般食用油同样使用，可多炒菜。二曰人造猪油糕，将等量的猪油和水放入铁桶内，用工具反复搅拌，使油水混合即可，油量增 40%，也就是节约 40%。（注 17）

仅立此存照，形形色色的粮食增量法无须证伪。它是为“低标准”的粮食政治服务的。科学一旦偏离轨道，荒谬便接踵而至。其实，“增量法”早已在公共食堂施行，无须推广。四川省委 1960 年 1 月 9 日《关于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指示》按“计划用粮，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原则，具体指示农事较少期间，争取每人每天吃四、五两细粮，三月以后保证吃半斤，配之以红苕、蔬菜。五月中旬，夏收季节，四川省委指示“从现在起保证每人平均每天至少吃十二两细粮”——这是 1960 年口粮安排的最高标准。自九月以后，全省上下各级都在为保证人平半斤贸易粮而努力。长期这样的标准，公共食堂一日两餐或三餐，主要依靠水来增量。二、三两粮食煮的稀饭可以掺数倍至数十倍的水，喝完上面，下面就沉下那末一点粮食。“豆腐多是水”——这是彭水地区常用的谚语，老少皆知皆懂，但饥饿使人格外贪求一时的肚腹之饱，以致于酿成灾祸。1961 年 5 月 10 日，县文卫党组向县委报告：四、五月以来，大河公社发生七例“肠梗阻”，两例死亡，主因是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太多。苏政理 4 月 3 日一餐吃了三斤半饭和很多菜，谢刚遂一餐吃了一斤干麦面块，外加 2 两多重的粗麦粩四个和很多菜。两人的共同症状都是肚子肿胀剧痛、大便不通，引起肠穿孔坏死中毒死亡。（注 18）三年饥荒时期，全县各地类似的疾病时有发生，民间称之为“鼓胀病”。

采食野生植物“代食品”在 1960 年秋收和秋收后被列入安排好人民生活的重要举措之中。

八月，秋收从南到北陆续展开。8 月 10 日，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方面，指示要求“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它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

九月，彭水县委指示各级在大抓粮食的同时大抓代食品。10 月 3 日，彭水县委下达《关于开展群众性的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意见》。意见指出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意义在于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全县以代食品代替一月口粮，即为 555 万斤，代替 3—4 个月的口粮，即 1600—2200 万斤，为数不小，大有作为。既然要做成运动，就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原子爆破、全面开火”的办法。10 月大抓家生淀粉，以包谷芯、秆、壳，豌豆秆、角，油菜秆、角，麦秆、高粱秆、稻草、糠壳、花生壳等为原料提制家生淀粉。10 月后以红籽、蕨根、葛根、青杠子、土茯苓、黄荆子、刺梨子等为原料提制野生淀粉。既然是运动，就要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用大辩论开路，统一认识。辩论的主要问题是：口粮为什么要“低安排”？半斤贸易粮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怎么办？是依赖国家供应呢？还是自己动手，生产自救？反动统治时期广大贫农、下中农是如何渡荒的？今天又应该如何渡荒？今昔对比有何不同？（注 19）

至此，采集野生植物，制造代食品不仅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而且成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领导的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

10 月 27 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给毛泽东送了几份关于制造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

的材料。毛泽东当日便批示“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在建议中，推介了橡子面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数种代用品，其中，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利用了微生物技术。建议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据英国一个学者的计算，一个酵母工厂，每天生产十吨酵母，即有相当于一万斤猪肉所含的蛋白质。而要有一万斤猪肉，即需化一年时间饲养80头肥猪才行。可以设想，将来城乡每个公社只要有一、二个规模并不很大的人造肉精，小球藻工厂，就可以满足全体社员对蛋白质和脂肪的需要。”“这些设想一旦实现，就会出现一次食物生产的新局面。它也可能是实现农业工业化，进一步解决农业劳动力，战胜自然灾害的途径之一。因此，关于粮食代用品的科学研究，不但对于解决眼前粮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远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注20）

11月14日，中央下达《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发出“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号召。在做具体安排时，紧急指示要求“在广大农村尤其是灾区农村，目前时期应当把重点放在群众过去习惯食用的、大量的、制法简单的、‘粗’一些的代食品方面；同时，有重点地试制和逐步推广新的、技术性较高的、营养成分较大的、‘细’一些的代食品”。

11月27日，四川省委对重庆市委批转市农业、园林局党组关于大采野菜，大搞野生代食品的意见作了批示，指出，大搞代食品，必须加强领导，安排一定的劳力，采取固定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坚持以食堂自制自食为主的原则，搞的多的多吃，搞的少的少吃，不搞调剂协作。

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纳入运动，逐层布置，逐层汇报，到9月29日，彭水报专区的原料储备为18061万斤，农业人口人均近600斤，已经行动的食堂1979个，占全县食堂的85%，两项指标均列专区第二。11月30日向地委报，农业人口人均家生和野生淀粉27.9斤，蔬菜种植面积296219亩，农业人口人均近9分地。（注21）还有不少汇报数字，不再一一列举。运动规律之一，表现为大量的数字游戏。但这是采食野生植物，是无奈的选择，是生存底线上的事情——运动规律之残酷可见。

实际上，1960年下半年后，农民采食野生植物，大量存在的是分散个体的形式，家庭单位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彭水地域广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平方公里80—90人。四季温和，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几十年过去，不少老人回忆三年饥荒采食野生植物，得以生存，仍溢感谢之情。笔者在采访调查当事人的基础上，整理出彭水地区三年饥荒时期采食野生植物种类的不完全目录——

野菜类

马齿苋 灰灰菜 薊菜 野葱 隔山撬 石蒜 侧耳根（鱼腥草）野油菜 山萝卜 野苋菜 水芹菜 野蒿 蒲公英 鱼鳅串 满天星（渥烟草） 酸浆草 牛舌头 猪鼻孔 野韭菜 苦苦菜 紫、白木槿花等

野生根茎类

蕨根 葛根 芭蕉头 家麻头 野白苕 土茯苓 金毛狮子 老虎姜等

野生果实类

红籽 青杠子 铁扫衣 野豌豆 巴岩豆 刺糖果等

此外，尚有枇杷、桐麻、肉榔树皮，多种树木的花和嫩叶。

上述野生植物，在彭水，帮助农民求生渡荒的大宗的、重要的当数蕨根和红籽，因此，记录于后：

蕨，亦称“蕨菜”、“乌糯”，蕨类植物，蕨科。多年生草本。根状茎长而横走，密被黑褐色茸毛。叶大，三或四回羽裂，侧脉两叉。孢子囊群生于叶背边缘；囊群盖条形，膜质，有假囊群盖。广布中国各地。生于山上阳坡或疏林下。嫩叶可食，俗称“蕨菜”；根状茎含淀粉，称“蕨粉”或“山粉”，可供食用或酿造；也供药用，有去暴热、利湿等效。（注22）

农民食用的主要是蕨根部分。将采挖的蕨根用水洗净，捶破，置于水桶中，反复搅动，使根茎所

含淀粉析出沉淀，即可取食。取过淀粉的根茎用火炕干，还可将其中含有少量淀粉的根茎碾碎磨细食用，这部分称“都栗子”，粗糙难咽，与少量粮食和野菜拌和做粑，可填肚，但不易消化。

红籽是别名（《全国中草药汇编》一书载，别名还有救军粮、救兵粮、救命粮等），它的学名是火棘。

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枝有棘刺。叶互生，革质，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先端钝，顶端有刺毛，边缘有圆锯齿，表面绿色，有光泽。春夏间开花，白色，伞房花序。果实秋天成熟，橙红至火红色，经久不凋。原产中国。种子或扦插繁殖。可作绿篱。果实可酿酒。（注 23）

农民食用的成熟果实，味酸甘涩兼俱。鲜用或晒（炕）干的果实碾（磨）成粉状，掺入少量粮食或野菜拌合做成粑蒸熟即可食用。由于红籽在彭水从低山到高山皆生长，其果实成熟期在冬季，正是农民缺粮时节，三年饥荒中，红籽成为彭水农民食用的大宗“代食品”，满山遍野的红籽每年几乎采食尽净，救活不少人。

不能列于野生植物大类的，有白鳝泥。

白鳝泥就是一种土壤，灰白色，土质细腻，采食的农民称之为观音土，取救人苦难意。彭水采食白鳝泥主要在高谷、鹿鸣、平安、龙射、靛水等公社的部分管区和生产队。鹿鸣公社向家管区自 1960 年下半年到 1961 年，农民普遍采食白鳝泥。（注 24）当事人张友连（83 岁）、张友志（70 岁）、张友玉（58 岁）向笔者陈述了白鳝泥的吃法：烤干，舂成粉状，掺进部分野菜或少许粮食，加水拌匀做成粑，烤（烙）熟即可食用。也可以做成汤元，不浑水。白鳝泥做成的粑或汤元除了自带咸味外，无怪味。干吃尚有一种土香味。只是吃时粘口，边吃边要用手和筷子帮助。最麻烦的是吃进去不是太难，屙出来艰难。有的因此遭活活胀死。

还有食人肉。

1961 年 1 月 11 日，龙洋公社五管区二生产队邵建文（男，19 岁）从靛水坝治病返家，走到卷洞桥。正在附近山上挖蕨根的同公社的邵瑞福（男，23 岁）看见邵建文身体虚弱，已不能行走。天黑后，邵瑞福将邵建文拖到黄泥洞，将其卡死，并脱去衣服（统绒、衬衣、内衣 4 件，长裤 1 根，共价值 7 元），割去邵建文身上的肉，回家煮吃。

此案一周后破获。邵瑞福不久病故，审理终结。（注 25）

1961 年 6 月 19 日（农历五月初七）早晨，凤鸣公社川间管区二生产队文本现的儿子文德全（男，12 岁）肿病死亡。文本现也因患肿病，无力安埋儿子。托人到生产队找干部安排劳动力，但口信没有带到。文本现对本队社员王应恒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我想犯个错误，把小孩煮来吃了。除头和肚肠甩在粪池，骨头烧掉外，初七白天吃的双腿，天黑吃的心肝，初八全部吃完。文本现的母亲，兄弟文本进，文本进的女儿四人一起吃的。

案破，文本现被逮捕，以“破坏粮食罪”起诉，不久，文病故，此案终结。（注 26）

2006 年 1 月 8 日，笔者步行到川间梅子坪——文本现的老家住地调查采访。文本现一家在梅子坪已经没有人了。文本现有一兄弟当年外出进厂，安家在外地，隔几年也会回来一趟，给亲人的坟头挂几树坟标。

在全县一些地方，还有若干起食人肉事，采访调查，述者言之凿凿，使人生不出理由怀疑，但笔者不再录入。

1961 年 5 月 3 日—4 日，彭水县委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会议研究抢治疾病和生活安排问题。据会议纪要内容，全县形势严峻——

疾病发展趋势令人忧心。不仅农村严重，城镇工矿也在发展；不仅复发病人多，新发病人也多；不仅肿干病人严重，妇科病，小儿病，杂病也严重。单是肿干病便突破两万，三级集中治疗一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加快。

生活安排的主要问题是公共食堂“四关”难过，违法乱纪大有抬头，吃“过头粮”严重。原预计全县按人平半斤贸易粮安排可以接到小春，但已经断粮和即将断粮名存实亡的三类食堂 555 个，三义

公社 34 个食堂断粮停伙 18 个。偷“青”吃“青”严重，上岩西公社农家、同麻管区豌豆已基本偷完，包括正在灌浆的大小麦也所剩无几。县里已无供应指标，而且国库无存粮。（注 27）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彭水工作组 5 月中旬对上岩西、大厂、龙塘三个公社进行综合检查后，向县委报告：干部违法乱纪严重，捆绑吊打社员普遍存在。区委组织委员说“我打人是粮食负责”，经常打人、罚款。5 月 8 日，将一偷胡豆的小孩，打得鼻孔出血。上岩西公社一生产队长用荨麻打人，一直不改。龙塘公社的两个大队长，吊打社员 26 人，吊打过重死亡 5 人。社会秩序混乱，今年以来发生杀人案件 15 起，偷杀耕牛 488 头，上岩西公社先锋管区偷杀耕牛 40 多头。四月下旬以来，二十多天发生杀人案件 6 起。4 月 23 日，上岩西公社双河管区一社员将发现他偷“青”，并言要告发的七岁女童黄大花用刀砍死。4 月 27 日，供销社干部鲁云忠收购物资回区途中被人暗杀。群众普遍反映吃不足半斤贸易粮。社员口粮要过“五关”——运粮、加工、干部、炊管、病号补助关。现在最严重的是运粮关。龙塘公社大堰管区，运粮每人每天补助 3 斤，5 月 11 日运粮 628 斤，即短少 111 斤。这个公社规定管区和生产队干部到县、区开会要另给口粮补助，石元管区大队长到区开会四天，即补助 8 斤粮食。公社还规定脱产干部下食堂吃饭，每人增加四两（熟饭），病员的补助也在社员口粮中抽取。上岩西、大厂、龙塘目前有肿干病人 1923 人（劳动力占 80%以上），占三个公社总人数 17.2%，1—4 月死亡 585 人，占总人数 4.9%。在治疗上，集中治疗少，分散多，实际上对分散的没有医治。集中治疗的管理差，医务人员少，药品缺乏，病房拥挤，卫生极差，口粮供应不落实。龙塘公社医院运粮跟不上，曾停伙三天。医院规定工作人员吃病员粮食，病员自己运口粮，近的十几里，远的四、五十里，有的昏倒在路上。医疗效果很差，病情没有好转。（注 28）

5 月 4 日，县委生活检查组向县委报告：四月以后，长滩公社疾病复发和新发急剧增多，死亡率增大。至 5 月 3 日，有病员 708 人，比三月底上升 77.5%，占全社人口 11.9%。病员中肿病 228 人，干病 334 人，全劳力 502 人。1—4 月，死亡 372 人，占全社人口 6.25%。公社党委书记住的麻油管区同期死亡 45 人，占管区人口 7.32%，如果加上上年 9—12 月死亡的 51 人，已占 15.6%。全公社 10 个管区中 8 个管区在 4 月 22 日前的 10 天左右每人每天口粮标准 6 两。兴隆管区四月中旬每人每天吃 2 两两天，吃 4 两三天。白果管区更典型，自去年秋收后便严重缺粮，先是按每人每日三两黄豆拨粮，后增加到四两直到 1961 年 2 月。该管区五食堂 4 月 20 日每人每天四两，月底断粮三天。部分食堂实行包两头后计工分吃饭的办法，降低了老幼体弱和病员的吃饭级别。兴隆管区高坎子食堂 4 月 26—30 日五天，每 10 个工分每餐生粮 4.8 两，最高的 5 人每天吃到 1 斤粮，管区大队长每餐吃到 1 斤 4 两饭。社员蔡继银原吃一级饭，每餐 14 两，因病降为四级，每餐吃 4.8 两。17 岁的女社员肖德素因病工分低，每餐由 9 两降为 3 两（1—3 岁儿童标准）。白果管区付家沟社员廖真贵身体虚弱，口粮定量低，在运粮途中饿极扒牛粪吃，回家第二天死亡。为了维持原级别的口粮标准，一些生病的社员也被逼出工，结果病情加重，造成死亡时有发生。公社和管区医疗点共集中肿干病人 405 人，药物严重缺乏，病员口粮得不到保证，12 个医务人员，6 人患病。病人蔬菜自带自吃，食堂吃高盐，上坡喝生水，引起普遍腹泻。公社医院 1—4 月死亡 20 人。（注 29）

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决定一是立即在全县开展创无病单位和评比先进医院、先进工作者的运动。就地取材大采土草药，大制土单方，狠抓生活和防疫卫生。五月中旬治好一批，五月底治好 80%，六月上旬基本治好。二是全县普遍开展清仓盘点，公社成立清仓委员会，管区成立清仓小组，所有农村干部必须亲自参加这一工作，深入重点，搞出样板，并宣布清仓的粮食不平不调，全部用作安排口粮。“允许社员在食堂吃饭，家家冒烟，自留地的产品完全由自己处理”。“照顾社员‘尝新’习惯，采取‘开前门’的办法，有计划有组织的吃一部分。豌豆，每人每天不超过半斤，不抵口粮”。（注 30）

特别时期特别措施。

5 月 26 日，彭水县委发出《关于当前人民生活安排情况简报》，普遍清仓盘点的结果，全县 497 个管区中的 240 个管区清出了粮食 527466 斤，平均每人 3.5 斤，按每日半斤贸易粮标准，为七天的口粮。如果以全县农业人口计，平均每人 1.7 斤，为三天多一点的口粮（注 31）。

其时，小满已过，全县夏收即将开始。但是，这并没有使粮食形势有大的改变。连续两年粮食大减产，从国家到地方，粮食库存几近枯竭，春荒持续数月，农民饱受饥饿煎熬，利涉各方的粮食矛盾突出，终酿成夏收的混乱局面。

进入 1961 年，全县农村公共食堂大多难以为继。三月中旬，据县委生活办公室对新田、芦塘、联湖、龙洋四个公社 129 个食堂的调查，能维持在食堂吃饭的 53 个，食堂煮饭，回家吃饭的 66 个，分生粮下户的 10 个。城郊公社亭子管区 8 个食堂散掉 5 个，继续存在的 3 个食堂也是时聚时散。该管区支部决议：1、老人不参加食堂，可以分粮到户。2、小孩一律不在食堂搭伙。3、不论轻重病号均可分粮到户。4、饲养集体耕畜户，分粮自煮自吃。5、劳动力参加食堂，但在食堂煮饭，不在食堂吃饭。（注 32）

公共食堂已是沉疴缠身。但因为《农业 60 条》的“三月草案”对公共食堂的方针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所以，谁也不愿跨出这个框架，而且，将落脚点放在“积极办好”上。3 月 18 日，四川省委提出贯彻中央方针的具体办法：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办好常年和农忙食堂，少数居住分散或者燃料确实困难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省委要求“目前对于食堂的调整不要马上进行，因当前是生产渡荒紧要时期。把现有食堂都应积极办好，现在只是摸情况，研究调整方法”。（注 33）

4 月 8 日，四川省委召集部分县、市委书记讨论省委制定的贯彻执行《农业 60 条》的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从会议讨论的发言记录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在会上，李井泉表现出宽松的态度，他在插话中说：“办小点怕什么？十几户也行，小到两户也可以，我比你们还要右倾一点”。又说：“我们不要求 100%的人都在食堂吃，这样要求是主观主义”。倒是参会的十多位县、市委书记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积极办好”的态度明朗。酉阳县委书记说：“在高山地区的食堂，是组织群众生产、生活的堡垒，必须坚持积极办好的方针。酉阳虽然是高山地区，我个人还是坚持办常年食堂。我们有办好食堂的榜样，有这样的经验。”他描述了榜样的木洞盖公社的面貌：生产、生活很好，一片繁荣景象。到处都看见妇女怀娃娃，到处能听见儿童唱歌。食堂有菜有粮，有锅有桌子，群众都到食堂吃饭，吃完饭就生产去了。群众说：“风吹不倒，炮打不散”。（注 34）

5 月 25 日，四川省委下发《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调查研究座谈纪要》，纪要以李井泉 5 月 11 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泽东的信的原则精神，对食堂的认识问题以及散伙的食堂和继续办的食堂提出了意见。一是必须正确理解食堂的性质，全面认识食堂的发展过程和作用，以及办好食堂的条件。过去办的食堂，确实有不少是完全出于群众自愿而办得好的，否定一切是不对的；但是，不顾客观条件，不走群众路线，主观片面地强制群众办食堂，也是脱离群众的。二是对于散伙和部分社员退出食堂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混乱现象。三是凡是继续办下去的食堂，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的办法，进一步办好。（注 35）

在李井泉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李井泉向毛泽东报告了到内江市交通公社临江大队调查社员赞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结果：16 个公共食堂，赞成继续办的 12 个，占 75%，不赞成办的 4 个，占 25%。不赞成办的原因是“干部作风问题”、“食堂燃料问题以致生活用工过多”、“居住分散，不便利群众，妨碍生产”，而不是公共食堂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多数仍要继续办好。在中央对公共食堂取舍的态度日见明朗的情况下，四川省委仍首鼠两端、徘徊观望。6 月 12 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农业 60 条》，四川在传达贯彻《农业 60 条》后，7 月 21 日正式发出指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不办公共食堂”。同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与之前的 1960 年冬一起是三年饥荒中肿干病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时期。（注 36）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彭水仍在进行整顿食堂的试点工作。据县委大河公社整顿食堂工作组的情况报告称，约有 20%的“官办食堂”生活安排不好。通过反“五风”斗争，进行了整顿，从而使食堂更加巩固，食堂吃饭人数增加，搬回家的桌凳重新搬进了食堂。至于个别办得不好，妨碍生产的食堂，经过充分讨论，根据群众的意愿，也有计划有领导地垮了一些。一管区整顿食堂试点工作的结果是：

原 10 个食堂，继续办常年食堂 6 个，两个改为农忙食堂，参加食堂 242 户，占总户数 69.34%；自愿退出食堂 89 户，占 25.5%；经群众讨论，开除地、富、反、坏 14 户，占 5.14%。在清平公社双河管区整顿食堂试点工作的结果是：原 5 个食堂，继续办常年食堂 4 个，1 个改为农忙食堂，食堂数未减。参加食堂 151 户，占总户数 93.38%，退出食堂 6 户，占 3.73%，经群众讨论，开除地、富 4 户，占 2.49%。（注 37）

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家知道的事实是：随着《农业 60 条》的下达，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很快散伙，即使是刚刚通过整顿，自愿参加食堂的农户也离开了公共食堂。

从《农业 60 条》“三月草案”到“六月草案”，三个月的时间，公共食堂的退却，经过调查试点，步步为营，从容不迫。在这散与不散的政治决策之间，农民生活艰难，非正常死亡随时在发生，人心动荡不安，农村社会和生产秩序日趋混乱。而夏收和小春分配继续执行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无疑加剧了这一混乱局面。

四川省委 5 月 9 日、5 月 21 日先后批转了内江地委关于内江县四合公社尖山大队 1961 年小春预分的情况报告和内江县凌家区大队掌握粮食的经验，对 1961 年小春粮食分配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在小春粮食分配中，贯彻“三包一奖”，实行以产计酬和奖赔兑现，落实“四粮”，由大队统一掌握粮食，保证完成征购，社员口粮继续执行“低标准”，指标分配到户，由生产大队和食堂共同保管，分期拨付。

但夏收和小春粮食分配工作的发展形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5 月 28 日，四川省委在向全省发出的《关于抓紧做好当前小春粮食分配和大队掌握好粮食的紧急通知》中指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面积一般已达到播种面积的 60%以上，有的甚至已到 80%，但大队掌握的粮食不多，进度很慢。少数地区又发生缩小播种面积，压低产量，以收代支，边打边吃，抛撒霉烂以及社员把粮食私拿回家等情况。通知指出了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的后果：生产大队不能把粮食掌握起来，而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又十分薄弱，不可能也没有粮食像过去那样不断地增加供应的情况下，就会大大增加今年渡过夏荒的困难。

彭水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 5 月 21 日发出《关于做好 1961 年小春粮食分配和征购工作的联合指示》，除重申认真贯彻执行省、地委一系列小春分配工作原则、政策外，具体安排了全县夏收和小春粮食分配工作。一是执行小春“三包一奖”，为大春“三包一奖”打好基础。包产合同切合实际，群众没有意见的，按原包产合同执行；包产指标偏高，可在原包产合同指标的基础上降低一定比例；没有包产合同或包产合同指标与实际差距大的，可按大队平均水平计算奖赔。在完善包产合同的同时，作好测产工作，核实小春面积，预测产量，清理工分和核实收支，做出小春分配试算方案，交群众讨论，让群众心里有底。二是坚持小春粮食安排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贯彻“多产多奖多购，少产少吃照购，受灾少吃少购，重灾少吃不购或救济免购”的方针。除留种和饲料外，口粮人均不到 40 斤可不征购，40—50 斤照购，50 斤以上适当多购。个别生产好或季节迟，早秋作物少的留粮至多不超过 70 斤。社员口粮指标分配到户，由生产大队和食堂共同保管，分期拨付。三是处理生产队增种和社员自留地种粮问题。生产队在包产计划外的增种部分除 20%以上交大队外，其余 80%应归生产队分配，体现谁种谁得的增种政策。社员自留地种植的粮食，一律不计产量，不征购。（注 38）

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至 6 月上旬，乌、郁两江沿河平坝和部分半山地区，小春收获面积已达大部或者过半，但全县 503 个预算单位（大队），完成预算方案的 120 个，不到全县预算基本单位的四分之一，做到部分兑现的 37 个，占全县预算基本单位的 7.3%。（注 39）而且，生产大队通过“三包一奖”实行对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制度在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矛盾。生产队组织生产，生产大队组织分配，性命攸关的粮食由大队统一掌握，自然会遭到生产队的全面对抗。宁可无产可超，不要超产奖，也要把粮食掌握在自己手中。压缩面积，降低产量，瞒产私分，更直接地是趁眼前有一点现粮，不要标准和计划，求暂时的饱腹。在生产队，社员私拿、吃青严重。部分生产队到夏收时，达到了已经无粮可收的程度，大队和生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规定，对双方都成了一纸空文。

下岩西公社第一次包产指标 635100 斤，第二次 60 万斤，第三次（6 月 9 日）510700 斤，五天后，6 月 14 日又回到第一次包产指标，反复定产，各大队包产指标变动频繁。最后按第一次包产指标的 85—90% 计算，下达到各大队硬套。已完成预分方案的 7 个大队按 535800 斤的定产计算，人均生产小春粮食 87 斤。根据口粮承认差别的政策，人均每日半斤贸易粮的 11 个队，8—9 两的 19 个队，9—10 两的 10 个队，10 两以上的 5 个队，共需口粮 294600 斤。按上述标准，以生产队计，42 个队中 33 个队能自给，9 个队缺粮，夏荒面 21.4%。但下岩西公社的预分方案由于以下原因在实际上很难兑现：1、小春成熟期和收割阶段，普遍存在“尝新”和边收边吃现象。7 个大队保守的估计，从小春“尝新”到 6 月 13 日这段时间吃粮食 163100 斤，占口粮预算的 55.34%，也就是过半的口粮已经在刚收获后即吃掉。同期，旦子大队吃掉 40700 斤，超过了该大队的口粮预算数，不仅无粮可分，而且无法完成征购任务。2、社员私拿多，吃青早，浪费大。豌豆才挂角，小麦刚灌浆偷青就开始。何家大队三月中下旬由于粮食调运受阻断粮，社员上坡剥胡豆，使胡豆基本无收。旦子大队社员私拿偷青 12100 斤，何家大队 8700 斤。由于面广，再加上有的兼以私分情况难以分清，处理困难。1961 年的小春粮食分配，上岩西公社完成包产指标的 61.7%，征购完成 12.72%，类似情况在全县普遍存在。1961 年上级下达彭水的小春征购任务 450 万斤，实际完成 263.9 万斤，占下达任务的 58.64%，这是三年饥荒时期，小春征购完成量和比率最低的一年。（注 40）

6 月 5 日，县委《大队掌握粮食的情况简报》（一）反映，围绕大队掌握粮食的斗争尖锐。汉葭区从开始的 78.43% 的起征大队，降到 62.73%。凤鸣公社从 4200 亩压缩到 2620 亩，单产 75 斤。城郊公社建设大队实收 620 亩，报 320 亩。三连公社同心大队 6 个生产队 8 个食堂各收各吃，该社 36 个生产队大多不按计划吃粮，红星大队三生产队吃干豌豆 3 斤算 1 斤，16 天吃 818 斤，东风大队小春包产 13500 斤，测产 12500 斤，报产 6200 斤，而且现在已无多少粮食。分支书龚庆华说：“粮食出来了，社员拖恼火了，叫他们多吃点。”县委认为更危险的是，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分支书记对大队掌握粮食产生动摇，失去信心，向错误倾向投降。葡萄公社洋芋一斤种子收一斤产量，公社书记王友龙说：“要留个退路。”下岩西公社旦子大队分支书张朝中说：“大队掌不掌握粮食没关系，只要社员有吃就行。”（注 41）

6 月 13 日，县委召开会议研究粮食问题，下面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要——

汤吉震（县委书记）：底子空了，有些地方搞乱了拿不起来，大春也难保不动手。汉葭区原来盲目乐观，而现在浪费那么严重，觉得没多少办法了。

于惠光（副县长）：确实发慌，下面情况也不摸底，找不着人负责了，征购入库才 2 万多斤。下去一看，边打边吃，浪费很大，粮食拿不起来。

陈志明（宣传部长）：怎样抓粮食，很棘手，很恼火，而抓不起来又怎样安排生活，更伤脑筋。（注 42）

6 月上旬，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实行三粮（口粮、种子、征购）就队落实，口粮分配到户。随着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实行两年多的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制度宣布结束，农民家庭重新恢复了独立消费单位的功能。而且，粮食分配就队落实，公社食堂解散，口粮分配到户，动摇了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开通了道路。

但这时，绝大多数解散时的公共食堂已没存粮，社员空身离开，不少地方小春收完吃完。为了落实口粮，上下有所交待，县里做出了社员私拿粮食，虽不批判斗争，一般也不退出，但要计算到户，抵做口粮的决定。城郊公社玉皇大队一、三、七生产队通过工作组走访社员群众，在干部中摸底调查，召开两次社员会议，三个生产队 79 户，69 户报私拿粮食 4178 斤，户均 60.4 斤，抵做口粮。小河公社木洞大队五生产队处理社员私拿粮食采取评议的方法，全队 32 户无一遗漏，最高 1200 斤，最低 200 斤，社员思想紧张，竟在三个晚上将未收的小春作物全部搞光。芦塘公社光辉大队将社员自报公议私拿的粮食 12000 斤全部作为口粮安排，而即使私拿数切近实际，但大多已经吃完。到七月初，这个大队的 155 户社员，占 54.2%，已断炊，南瓜叶也吃光，有的社员在家里坐着哭，有的上坡偷刚起苞的

包谷吃。一、二、四、七生产队停止生产。猴狸公社金池大队规定私拿粮户交现粮，每交 10 斤现粮奖励 1 斤，交出 812 斤，远达不到预计要求。接着采取评议，评议出 13000 斤作为现粮给社员安排生活。目前，这个大队有 103 户社员反映已无粮食。全县 516 个大队，社员口粮不落实的 410 个，占 79.5%，其中，有 232 个大队在处理社员私拿粮食的工作上存在问题。（注 43）

6 月 24 日，郁山区委书记叶顺福到三连公社红星大队五生产队帮助处理社员私拿粮食，落实口粮安排问题。之前，召开四次群众会议未果。公社党委驻队领导决定采取分配任务的方式解决。分配第五生产队社员私拿粮食 2800 斤。叶认为这一作法有违政策，便于当日下午到该队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叶将带在身上的加拿大手枪搁置在桌上，中途有一小孩好奇摸枪，叶将枪拿到手中，检查扳机和保险，当时社员正在自报，约 10 点 45 分，枪响，射出的子弹从女社员谢立碧的右腰穿过，接着又穿进女社员何祖碧臀部。当时会场混乱，会议不果而终。谢立碧受伤过重，送往郁山医院途中死亡。经抢救，取出何祖碧臀部弹头，脱险。次日，即用白布一丈，棺木一付将死者安葬。区委给死者丈夫 30 元以做暂时抚恤。6 月 26 日，县里再给死者娘婆二家各 100 元抚恤费。死者丈夫王继先满意，只是耽心今后缝补有困难。干部主动说：只要你劳动积极，一定很快给你找个对象。王由悲转欢。（注 44）

（本章所附档案书证及注释略。） 【交流文稿】

《定西孤儿院纪事》节选

黑石头

杨显惠

我是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的人。

黑石头是个很出名的村子。听老辈子的人说，一天夜里，随着呼隆隆的一声巨响，天上飞来两块神石落在村前的牛谷河边上。这两块石头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高的近乎一丈，矮的半人多长，黑黝黝铁疙瘩一样杵在地上。十里八乡的人们跑着来看，谁都不相信石头会飞。但时间不长，石头又飞了一次。一个妇女晚上收工回家，在牛谷河洗完了脚，把裹脚布晾在石头上没拿，她想第二天下地时再裹脚，不料去找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全村人惊了，到处去找，发现两块石头都杵在村后种谷子的坡地里。这下人们才相信了，这是一对神石。人们都说，神石被女人的不洁之物冲撞是不吉之兆，全村人都要遭受报应的。

黑石头有三个商号，一个是斗行，人们买粮卖粮的铺子；一个叫荣福祥，是个杂货铺，收土产品也卖土产品的商店；还有个字号叫钱永昌的，是个钱庄，给农民放款的。

荣福祥是我大大（注 1）家开的。我大弟兄三个，我大是老三；二大在县城当老师。

我大解放前也是经商的，在碧玉关有铺子。解放后政府给我大戴了顶地主分子帽子，赶回家来了。

1958 年，我大上引洮（注 2）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注 3）。到了第二年农历九、十月，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吃了，散伙了。

食堂没粮食吃了，家里就更没吃的了。从五八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为了搜陈粮，把我们全家人都撵到二大家了。工作组在我家搜了三天，拿铁棍捣地，拿斧头砸墙。我跟村里的娃娃们跑进去看了，我家的院子里面挖出来几个窑，但没有搜出一颗粮食。我回家给我娘说了，娘说那是解放前没分家时我大大窖下粮的空窑窑，窑里的粮食土改时早就搞光了。

我二大家的院子也搜了，挖了十几个坑，连猪圈都挖了，也没挖出粮食来。二大的房子是临解放才盖的，二大是中学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窖过粮。

食堂散伙时，天天喝稀汤，食堂散伙后连汤都没处喝了，我娘就把谷衣（注4）炒熟，磨细了，再把苜蓿根挖出来剁碎炒干磨成面，两掺和着打糊糊喝，当炒面吃。

食堂散伙一个月，我奶奶不行了。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我奶奶临断气的时候躺在炕上说胡话，喊大大、二大和我大的名字。那时我娘的身体也不行了，走路摇摇摆摆的，我娘就打发我去叫大大家的大嫂子。大大家的大哥会木匠活，结婚后分出去单过。那时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背着木匠家什去外边做活，叫人谋害了。大嫂子不知道，还在家里守着。我找到大嫂子说，奶奶放命着哩，我娘叫你去看一下。一叫，大嫂子赶快拿了一块榆树皮做的馍馍到我家去，给奶奶吃。那时候榆树皮馍馍就是最好的吃头了！食堂一散伙，家家没吃的，抢着剥榆树皮。我妈身体弱没剥上。榆树皮切成碎疙瘩，炒干，再磨成面，煮汤。那汤好喝得很；粘乎乎的，放凉了吸着喝，一碗汤一口就喝下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奶奶都昏迷了，说胡话了，可是大嫂子把榆树皮馍馍往奶奶嘴里一放，奶奶就不胡喊了，啃着吃开了。可是奶奶七十多岁了，早就没牙了，哪里嚼得动放凉了的榆树皮馍馍呀！我嫂子用刀切碎了给奶奶喂，我给奶奶灌水，奶奶就能嚼动了。喂着榆树皮馍馍，大嫂子说，奶奶怕是真不行了，我娘就把老衣给穿上了，就是裙子扣子没系住。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老人死了要穿裙子，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那种裙子。

奶奶吃完那块榆树皮馍馍又活了三天，三天后再没吃的，就去世了。

当时我和我娘我奶奶睡在一盘炕上，奶奶睡在窗根离炕洞口近的地方，这儿炕热一些，娘睡在离炕洞口远的上半截炕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中间。睡到半夜里，娘把我推醒说，巧儿，奶奶没了。我娘又说，来，巧儿，咱们把奶奶抬到上炕上。奶奶那时干瘦干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但我们没抬动。我没力气，我娘更没力气；我娘那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在家里走路要扶锅台，扶墙。我和娘在炕上跪着，从一边掀，把奶奶掀着滚了两下，滚到上炕上去了。

然后我和娘又睡下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那时候人死的多，看下的也多，神经都麻木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害怕。

天亮之后，我娘又说，巧儿，你出去叫个人去，不管谁家的，有大人了就叫来，就说奶奶没了，帮着抬埋一下。

黑石头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得很，一、四、七的日子，左近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这赶集。可是今年以来除去赶集的日子，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人。很多人家的门上挂着锁子，没锁的人家也空荡荡的不见人。我到街上转了几家没锁门的人家，只有一家有人，是个姓毛的老奶奶在家里。我进了她家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都是空空的。老奶奶看我乱窜，问我，巧儿，你做啥哩？我说毛奶奶，我奶奶没了，我娘叫我找个大人。毛奶奶说，巧儿，你奶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我看她洋混子（注5）着哩，就大声说，毛奶奶你家的人呢？毛奶奶说，死的死掉了，活的就剩个福祥娃拾地软儿（注6）去了。

我没找上人，回家告诉我娘，娘说，快上来，上炕暖和一下。我上了炕和我娘坐着。奶奶就在上炕上躺着。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娘又说，巧儿，你再看一下去，毛奶奶家的福祥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就叫他找一下队长去，叫队上帮个忙。我下了炕正要走，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得啪啪响。我心里一惊：这是谁知道奶奶没了！

娘说，快去开门！看谁来了！

我跑出去开门，原来是福堂哥来了。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二十来岁。他的脊背上还背着个背篓。我说福堂哥：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来看看姑奶奶的。我说我奶奶没了，饿死的。福堂哥一听就跺脚：哎呀，我大怕姑奶奶没吃的，叫我送些吃的来。你看这还来晚了！

福堂哥进了房子，看奶奶停在炕上，我娘也在炕上坐着，就说，人已经没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吗？也不找人抬埋？我娘说我出不去门了。我也说一早上就去找了，没找上人。福堂哥说他看看去。

福堂哥去街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他回来后说，我先回去，明天从碧玉叫几个人来。

第二天，奶奶的娘家来了几个人。奶奶的棺材是几年前我大就做好的，只是没有合卯，没刷漆。娘家人合了卯，白皮子棺材把奶奶抬出去埋了。埋在老坟旁的一条向阳的地埂子旁边，天冷，地冻上了，没法在坟里挖坑。

奶奶去世后，我和娘靠着福堂哥背来的东西将就着过日子。他的背篓里装了些晒干的萝卜叶子，萝卜叶子下面压着四五斤糜子，还有些烙熟的麻腐（注7）饼子。我娘身体弱得下不了炕，家里一切都靠我：我把糜子在石臼里捣碎，捣成面面再煮成汤，放上萝卜叶子或是苜蓿根磨下的渣渣，和我娘喝。福堂哥拿来的东西大部分叫我吃了：我娘光喝汤不吃麻腐饼子。我叫娘吃，娘说你吃吧，你多吃些干的，我喝些汤就成了。我已经动弹不成了，你再不能饿垮了，里里外外都靠你哩。其实那年我才十岁。

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的还早。我哥是1959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我大和我娘的感情特别好。我娘人长得漂亮。我娘是襄南乡的人，是我大做生意时看下的，看见我娘长得漂亮，叫媒人去说亲。谁知我外爷（注8）不同意。我外爷家也是大户人家，但不封建，嫁姑娘要姑娘同意，我娘却不同意，嫌我大长得不俊。其实，我大长得不难看，就是皮肤黑，我娘看不上。可是我大就是看上我娘了，我大跟人说，非我娘不娶。后来他自己跑到我娘家里去说亲。旧社会哪有自己给自己说亲的，特别是在农村，那不成体统呀！可他把我娘感动了，我娘嫁给他了。

从哪里说我大和我娘感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家庭，谁见过男人给女人做饭的，尤其是光景好的人家！我大就给我娘做饭。我大和我娘结婚以后，我娘在黑石头侍奉我爷爷和奶奶，我大在碧玉关做生意，一两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每次回到家里，我大就和面擀面做饭，不叫我娘动手。这是我娘自己给我说下的，解放前的事。我娘还说，就因为我大给她做饭，我奶奶还生气得很，说我大怕媳妇；我大就给我奶奶解释：我一年四季在外头，都是媳妇侍奉你，媳妇也辛苦嘛，我回家来了，做两顿饭她休息一下有啥不行的。解放后我大回家种地了，那就更是经常性地做饭了，因为我娘那时也下地劳动，收工回来就累得很了。我娘是娇小姐出身，从小没受过苦。

我再举个例子，我大去世后，我娘烧了七次纸，逢七就烧，七七四十九，烧了七次。现在看来烧七次纸没什么，家家都这样。可那是六零年呀，大量死人的时期呀，一般人家拉出去埋了，烧上一次纸就罢了，可我娘烧了七次。尤其是后来的两次，我娘走不动了，——那是奶奶死后的事了——娘是跪着挪到大门外，又挪到村外头，给我大烧纸的。

说起烧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奶奶去世后的两三天一个晚上，那天又是我大去世后逢七烧纸的日子，不记得是四七还是五七，我娘说要给我大烧纸去。可她扶着墙走到大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扑通跌倒了。还是我扶着她慢慢地走出巷道去的。我和娘烧完纸了，慢慢地走回来。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我关上门回到房子，点上灯，看见娘的头钻在被窝里。我说娘，出来吧，扣儿娘走了。我娘掀

掉被子看我，说我的头流血了。到现在我的前额上还有伤疤，在左边。我娘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知道是扣儿娘还跟出去送她？我说咋了？我娘回答，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我不信扣儿娘要吃我们，但我问我娘：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娘长长地叹息一声没回答，半晌才说，门关好了吗？记住，以后不准你到扣儿家去。

过了十几天，福堂哥背来的菜叶子和粮食吃完了。家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谷衣也吃光了，只好吃麦衣和荞皮。

连着两三年生产队不种荞麦了，嫌荞麦产量低，想吃荞皮也没有呀！我娘就把枕头里的陈荞皮倒出来吃。荞皮硬得很，吃起来很麻烦：拿火点着，烧焦烧酥了，叫我用石舀捣碎捣成面面。然后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一边煮一边搅。那是草木灰呀，在水上漂着和水不融合呀。等搅得成了黑汤汤，大口喝下去。荞麦皮苦得很，就要大口喝，小口喝不下去。喝些荞麦皮灰然后一定要吃些地软儿什么的，否则就排泄不下来，肚子胀得要死。有一次，我趴在炕沿上，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我哭着跟我娘说，娘，我再也不吃荞皮了，饿死也不吃了。我一哭，我娘也哭，娘说，我的娃，要死容易得很呀，我早就不想活了，可我死了，你也不得活呀。你不得活了，我咋给你大交待哩。

我好久没哭过了，我大去世的时候没哭，奶奶去世也没哭，但是这天为了吃不吃荞皮的事大哭了一场。原因是以前家里没了那么多人，我已经麻木了，也不害怕，因为我娘不管吃什么都多给我一点，我没有太挨过饿，没有想过自己会死，觉得有娘哩天大的事都能过去。而这几天吃下的荞皮差点把我胀死，我突然觉得死离我是这样的近，就像只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而且我娘的痛哭使我觉察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是保护人的我娘并不那么强大，相反很是软弱无力！巨大的恐惧揪紧了我的心：我才十一岁，还没长大，就要死去吗？就要像人们扔在山沟沟里的死娃娃一样叫狗叫狼啃去吗？这太可怕了！

娘，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真是要饿死了吗？哭了好久之后，我抽抽噎噎地说。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娘这时已经不哭了，她目光呆滞滞地看着我。好久好久才说，巧儿，我的娃，你害怕死了吗？

我没回答我娘的问题，那一刹间，我感觉到我娘一眼看透我的灵魂了，看出我的恐惧了。不知是羞愧，还是害怕，我哑口无言。这时我娘又宽慰我说：

我的娃，你把心放宽，娘能把你养活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说，娘，那我们吃啥呢？

我的娃，你到街上看一下去，今天是集日，看一下赶集的人多不多？

到集市做啥呢，你要买啥吗？我对娘的话很不理解，不愿动弹。可娘催我：

去嘛我的娃，你去看一下去，村西的那块空地上有没有卖木头买木头的人？要是有一堆一堆的木头，有人买，你就把他叫到咱家来。你跟他说，咱家有木头，比集上的便宜。

我还是不理解娘说的话，我说，娘，咱哪有木头，你能变戏法变出木头来吗？

娘说，咱家怎么没木头？下前川的房子拆了不是木头吗？

我心里一惊，说，娘，咱住的这房是二大家的：二大没了，二娘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二娘回来要房子，咱家的房子又拆了，咱到哪里去住哩？

娃娃，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再多的家业也是闲的，把肚子吃饱，是顶要紧的。

尽管是灾荒年间，集市上仍然有稀稀拉拉赶集人。我和庆祥吉祥还有扣儿去牛谷河边的草滩上拾地软儿，总是从集上过，总看见卖馍馍卖油饼卖粮食和麸皮的人。卖馍馍的人把馍馍装在怀里，遇到要买的人就从怀里掏出来馍馍叫人看一下，接着很快就又塞进怀里。等对方把钱交了，他才摸出馍馍交给对方。一个馍二元钱，一个油饼四元钱，一斤小米七元。

但这天我没在这儿停留，我直奔买卖木头的地方。这地方也比前几年萧条多了，卖木头买木头的人稀稀拉拉的，新木头很少，人们都是买卖旧木头旧椽子的。

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许久，才鼓起勇气走到一个要买椽子的大人跟前，仰着脸说，大大，你要买椽子吗？我家有椽子，你要不要？那买椽子的人侧着身看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家的椽子在哪里，一根卖多少钱？我说价钱你跟我娘说去。我娘病了，在炕上睡着呢。

黑石头村在牛谷河边上一片很缓的山坡上，集市把村子分成上前川和下前川。我把那人领到上前川叫他去见我娘。那人进了院子四下看，没发现椽子，进房后问我娘：你们家的椽子在哪里？

我娘说，我们先谈价钱，价钱谈好了，你拆房子，房子在下前川，椽子是上等的松木。那人说要先看椽子，我就又领着他到下前川我家的房子去了一趟。我家解放后定为地主成分，四合院的房子没收了三排，给我家留下了一排四间房。看完房子，那人又去见我娘说椽子是上等的，但拆房子是个累活，一根椽子比集市上的便宜五角钱卖不卖？我娘说卖。

那人拆了八根，一个毛驴驮走了。这天下午我就买了六个谷子面馍馍回到家里。我娘说这六个馍馍得一斤半面才能蒸出来。六个馍馍我和我娘吃了三天。我把馍馍揉碎，和我拾来的地软儿煮成糊糊，一天喝一顿。一顿我喝两碗，我娘喝一碗。

下一个集日又卖了十六根椽子……后来，椽子卖完了，我娘把三根大梁子也卖了，一根梁卖十元钱。多粗多大的梁呀，比我穿着棉袄的身子还粗。最后，我娘把我家的一盘石磨也卖了。买磨的来了两个人，是我看着他们把磨盘卸下来，滚到大门口，一辆架子车拉走了。卖这盘磨的钱买了十个谷子面馍馍。这样我和我娘就凑合到腊月底了。

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间，家里又没吃的了。我娘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干脆就下不了炕了，天天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睡着。我娘的脸干干的了，眼睛塌成两个洞洞，脸腮也陷成两个坑坑。肉皮像是一张白纸。贴在骨头上。娘下不了炕就得我添炕了。我用扣儿娘打过我的灰爪——一个木头棍棍，前头钉了一块横着的木条条——把麦衣和秋天我娘从山沟里扫来的树叶干草推进坑洞，一天两次。每过两天，还要把死灰扒出来一次。这是我娘能动弹时教会我的。我娘说，丫头，你要学会添炕，我死了没人给你添炕，把你冻死哩。我不爱听娘说这样的话，她一说我就不添炕了，我说我不学了，你死了我就跟你一搭死去。这时我娘就哄我，说，死丫头，你还歹上(注9)了。娘不死，娘要陪你过一辈子，可是你长大出嫁了还要我给你添炕吗？我说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并不会因为天气冷肚子就不饿了。不，天越冷肚子饿得越厉害，没办法，我跟着庆祥吉祥弟兄又去拾地软儿了。庆祥和吉祥是我三姨娘的娃娃。庆祥比我大两岁，吉祥比我小一岁。我娘跟我说，她嫁给我大不久，三姨娘也嫁到黑石头来了，给了钱永昌钱庄老板家的大少爷。三姨夫前两年因病去世了，三姨娘三个月前就死了。三姨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几月前就跑到内蒙去了，两个小的现在在大家过日子。入冬后他们弟兄天天在沟里拾地软儿。他们的大大有个儿子在襄南公社粮管所工作，家里没死人。

冬天的地软儿特别不好拾。天旱，地软儿小得很，在草底下藏着不容易找到。但地软儿泡软了好吃，有营养，我和娘烧汤喝。

靠着拾地软儿过了半个月，我也饿得走不动了。正好这时供应救济粮了。

是生产队长王仓有到我家通知到大队背救济粮的。大队就在黑石头村里，我去背的，给我和娘四斤大米。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走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沙锅。也没有柴了。院子里只有一个不知啥时候挖下的树根，可我和我娘劈不开。我娘就把沙锅放在树根上，——由于有了大米，我娘精神大了，鼓起劲从房子里爬出来了——我娘叫我抱些麦草放在树根底下点着。我娘想把树根烧着，我们从两边吹气。树根上的树皮着了火，有了红火，后来麦草烧完了，红火又灭了。想煮米汤，水没烧开，米倒是泡软了，我们就喝了。

过了五六天，那几斤大米喝光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食堂又恢复了，一天叫社员打两次稀汤。我听人说，救济粮一人一天四两(注10)的标准。四两粮能做什么饭，就只能喝两顿稀汤。

就在我们喝稀汤过日子的一天，庆祥和吉祥到我家玩来了。我娘问他们：这几天不见你们两个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庆祥和吉祥抢着回答，我们到福利院去了。我娘问福利院是做啥的，庆祥说福利院是收娃娃的，那里能吃饱。我娘又问福利院在哪达哩？庆祥说，福利院就在襄南公社院子的隔壁，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

我娘坐在炕上和三姨娘的娃娃说话，听说在福利院能吃饱饭，就又问：福利院能不能把巧儿也要下？

庆祥说，那不行呀姨娘。福利院要家里没人了的娃娃。

庆祥和吉祥说完就走了。他们是从襄南来看一下黑石头的大大的，还要赶回福利院吃晚饭，二十里路呢。

我娘和庆祥兄弟说话的时候在炕上坐着，那兄弟走后，我娘就躺下了。她的一只手搭在脑门上，长时间闭着眼睛。我当成娘坐的时间长了，乏了，要缓一下，提上树皮桶桶拾地软儿去了。可是这天后晌回来，我从食堂打来的汤我娘一口也没喝。第二天上午也没喝汤，还是静静地躺着。

娘的情况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娘不行了——我大我哥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不说，睡着睡着就没气了。我想，娘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这天我没出去，我把头一天拾下的地软儿泡软，洗净。晚上的面汤打来之后把地软儿放进去煮了煮，稠乎乎地给娘舀了一碗，端过去：

娘，起来喝些汤。

娘没说话，只是把睡在枕头上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是大声地嚎。

像是我的哭声把娘惊了一下，我娘一下子就坐起来，比平常坐起来的速度快得多。娘惊愕地瞪着我：你哭啥呢？

我还是哭：你怎么不喝汤呀……我当成你不行了……

我娘嘴咧了一下，她是想笑，但她干巴巴薄得没肉的嘴唇没笑出来，嗔怪地说，死女子，你怎么胡说哩。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喝汤？

死女子！娘这两天不觉得饿，就不想喝呗。

我说，可我当成你要死了……

死女子！我能死吗？我死了谁管你去！谁给你做衣裳哩！拿来拿来，把我的碗端来，我叫你看看我能喝不能喝，我是死哩还是活哩！

这天晚饭，娘喝了两碗稠糊糊。而且第二天早饭端来食堂的稀汤之后，她也比往常多喝了半碗。

我娘不光是能吃了，还能干活了：这天喝完早上的一顿汤，我去掐苜蓿了。黄昏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娘在炕上忙碌着：不知道她从哪儿翻出来一捆羊毛，扯着，撕着，把炕都堆满了，连空中都飘着毛絮。我说她，娘你不缓着，撕羊毛做啥呢？娘说，我给你做条棉裤。

娘能坐起来做活了，我心里多高兴，这说明她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好了，但我怕娘累着，就说她：我的棉裤是去年拆洗过的，添了新棉花，暖和着哩，你就不要再做新的了。你睡着暖着。我说的实话，我们村子的娃娃们冬天都穿的破棉袄，还是空心穿棉袄，下身只穿单裤单鞋。更有甚者，十几岁的男娃女娃连单裤都没有，冬天冷得出不了门，在炕上蹴着。而我娘两年就要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和新鸡窝（注 11），第二年穿时衣裳旧了，就做一件新褂子套上，过年总要穿新的。这两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娘也时不时地被队长派出去劳动，大战华家岭，拓宽华双公路，没时间也没钱给我做新棉衣。不过旧棉衣拆洗过了，裤腿也加长了，穿着挺暖和。在沟里洼里拾地软儿，剜野菜，我没觉过冷。但我娘不听我的话，用嘲笑的口气说，你潮着哩（注 12）！衣裳穿不破吗？

我说，破了再说破了的，明年再做嘛。

可是娘不听我的话，喝完汤之后在煤油灯下还撕扯了一阵子羊毛。她把一疙瘩一疙瘩的羊毛撕开，扯虚，把里边的尘土抖干净，扯成一片一片的堆在炕上。全部羊毛撕扯完了，才睡觉。

后来的几天里，娘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她把箱子里的碎布找出来，又把她年轻时穿过还有八成新的衣裳翻出来拆了，量呀裁呀絮羊毛呀，给我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棉裤做成的那一天傍晚娘叫我换衣裳，把旧的脱了，把新的穿上。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注13）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娘又笑一下说，你不长吗？长大就不长了。

我嫌新棉裤大，没穿，转天早晨又穿上旧棉裤提上树皮桶桶掐苜蓿去了。

其实，再穿不了几天棉裤了；已经是农历二月了，春天已经悄悄地到来了黑石头。虽然，我们通渭类似高寒阴湿山区，但是春天毕竟来了，阴山洼洼的残雪还斑斑点点闪着蓝莹莹的白光，阳坡上的青草芽芽已经冒出地皮来了，山坡上的冬麦地也开始由黄转绿。从前川背后的山岭上往远处看，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就像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绿雾。空气也像是比冬天的干净鲜亮，吸到嘴里舒服得很，有一股青草芽儿的气息。

苜蓿地就在黑石头村背后的山坡上。苜蓿长得真快呀，前几天来掐苜蓿，还要把地面上的土疙瘩刨开才能掐到黄芽儿，现在就不刨土了，因为苜蓿芽芽已经把地皮拱翻了，长出来半寸长了，圆圆的叶片由黄色变成嫩绿。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殁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杳杳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趑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付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

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噚噚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褪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伸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看，骂我：

瓜子（注14）！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注15）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福利院能吃饱。

1968年我回了一趟黑石头。那时我已经到五大坪农场当农工一年多了，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我存下了一些钱，我把钱寄给我奶奶娘家的福堂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福堂哥。我说我存下了五十元钱，你操心着打三口棺材，我要把我奶奶、我大和我娘的坟迁一下，迁到祖坟里去。我家没儿子了，就我一个女子了，我要给我大我娘尽孝心哩。福堂哥把棺材打好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请假回黑石头去了。我娘的坟挖开后，是我自己把我大我娘的骨头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的。帮助迁坟的富堂哥说他来干，女娃子不能收骨头。我非要自己收不可，我说我们家没有男娃子，但是有后人，我就是后人！

那一次回家，我见到扣儿娘了，扣儿娘避开了，没和我说话。

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

注1：甘肃中部方言，爸爸称大，若父亲有兄弟多人，则将父亲的大哥称为大大，二哥称为二大……比大小的，是老几就称几爸。

注2：甘肃省委1958年大跃进上马的共产主义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说是要修一条山上运河。十六万民工辛苦三年，以失败告终。

注3：甘肃中部的最高山脉，主峰海拔2457公尺。1926年始建1929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经过此处。

注4：谷糠。

注5：糊涂，神志不正常。

注6：生长在高寒阴湿地区的一种菌类植物，生长在地面上，貌似木耳，但形体小，薄。

注7：麻籽磨碎，成豆腐渣状。

注8：方言，姥爷。

注9：方言，生气，发脾气。

注10：旧秤，十六两为一斤。

注11：手工制作的絮有棉花的布棉鞋。

注12：方言，傻瓜，弱智。

注13：五六十年代小女孩们的游戏。

注14：傻瓜。

注15：家庭没有了男孩子，在农村被称为绝后。 【网友推荐】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刘岩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1972年6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许多报刊书籍，纷纷刊载有关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及整个追悼会举行情况的逸闻，其中有些关键性情节与实际出入较大，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出版物和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讹传讹，将一些杜撰的虚假情节当做历史事实。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同志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贡献出来，供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一、临时受领撰写悼词任务

1972年1月7日晨，总政治部的班车刚开进旃檀寺办公楼，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领导同志叫去交待任务：立即去干部档案室借出陈毅同志的档案，在办公大楼门前等候王迪康秘书长，然后随他前往三座门（军委办公地）执行任务。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上级没有告诉，去了就会知道的。”

上午8点多钟，参加会议的人员在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集合，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向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月6日）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他是治丧小组成员）同志以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同志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同志。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三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这样，撰写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二、对陈毅同志的评价上面没有人愿意定调

任务布置以后，分三摊开始工作。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迪康秘书长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带来风险。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任免干事，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我就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四名，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同志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三、陈毅悼词稿基本上是参考了罗李两篇悼词写成的

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人同我在一起研究讨论，加上陈老总的干部档案材料里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鉴定、结论等文字的东西，所以我交出的悼词草稿，实际上是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的写法，加上我自己平时对陈老总的良好印象而形成的。在草拟过程中，悼词的格式和评价的措词，这两点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格式问题比照罗、李悼词的结构填写就是了，评价措词基本上与给活人写鉴定差不多，而我在军委办事组干部室和总政干部部任免处工作几年，常为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写鉴定，难的是篇幅的把握。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悼词篇幅的长短应是规格的体现，陈老总的悼词到底写多大篇幅才符合“规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这一点费的周折比较多，翻来覆去的几次修改，主要是

在字数上考虑。1970年10月5日《解放军报》刊登的，由吴法宪为李天佑所致悼词共246个字，我想“略多于”这个字数，比如说多写50%，也只能写370个字，我所设想的内容根本容纳不下，但超过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则，斟酌再三的结果，决定按李天佑悼词报载字数的两倍左右来写，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尽量简化经历部分，以便将节省的字数用于写评价。初稿中简历只用了157个字，占全篇幅的27.7%，（罗帅悼词中的简历部分占了全篇的39%、李天佑占37%）。下午我把初稿交给王秘书长审示，他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我抄正后他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同志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同志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然后《请示》进行打印，悼词未打印，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同志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叶剑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至此，我起草悼词的任务即告完成。

四、悼词的修改情况

为便于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这里不妨将566字的悼词原稿抄录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因患重病，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刊载：1月8日，周总理“审改对陈毅的悼词稿，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际国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①毛泽东阅后删去功过评价等补写文字”。②据了解，毛主席在删改时批了两段文字：“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9日，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通过对陈毅的悼词”。③

1月1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共538个字，与上报草稿对照，删去49字，增写21字，实减28字。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总理所致悼词全文，1月11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

五、追悼会的规格升级

中央军委在向党中央关于陈毅同志治丧请示中提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三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一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名单是：中央政治局

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党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耿飏、郭玉峰、王良恩；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北京市委吴德；军委各总部负责同志；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同志各 1-2 人；陈毅同志生前友好。

周总理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七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周总理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 1972.1.8 五时”。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九个字，其他四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总理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 9 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 月 10 日早饭后，参加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刚吃过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同志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总参管理局的一名士兵文书）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我把这三件事办完不一会儿，周总理就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这时总参通信兵头天临时架设在礼堂大门西侧小屋里的两部军线拨号电话，已经改成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周总理用它为追悼会作最后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追悼会由于毛主席的出席，规格马上就比原计划提高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叶剑英同志改为由周总理致悼词；二是增加了花圈数目，毛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周总理、康生、朱德、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计划中没有的；三是实际参加追悼会的人增加到 1500 名，领导人中新增加的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全国人大常委会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全国政协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顾明杨等。此外，原计划追悼会“不通知外宾”，后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夫人，也一左一右扶着毛主席入场出席了追悼会。

六、治丧活动的组织紧凑而有序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比较仓促，在他弥留之际没有对他的后事预作安排，从他心脏停止跳动到开追悼会，中间只相隔 87 个小时，合三天半多一点；治丧计划的制定、悼词稿子的草拟等工作，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然而，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同志的严密组织，尽管因为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追悼会而使计划突然改变，但是整个治丧活动进行得紧凑而秩序井然。当时，除了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里三个小组进行的工作以外，在 301 医院遗体告别场地和八宝山追悼会场，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会场取暖问题。开追悼会的 1 月 10 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贵宾的休息室和追悼会大厅内，必须万无一失，保证安全，这样，不得不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 8 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从而保证了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保持了空气洁净。追悼会于 10 日下午结束，三天的治丧活动进行得顺利，没有发生任何纰漏。据我所知，逝者的家属张茜同志，除了在追悼会前索看陈毅同志悼词

的要求，因党中央没有将悼词的审定稿退给治丧小组而未能如愿以外，其他方面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大家都比较满意。

①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7 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4 页。

[作者刘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少将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91。]

选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网友推荐】

反对权贵资产阶级

伍石泉

读辛子陵先生《2011 年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我认为很精辟、很精彩，很受教益。以前写了一段《读书心得（五）---共产党应该理直气壮搞资本主义》，现在再写一段《读书心得（六）---联合起来反对权贵资产阶级》，继续与辛先生交流。

一、中共执政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吃肉骂娘之声不绝于市，民怨已经很深。观前车之覆，苏联 74 岁寿终，苏共余党在大方向上至今还找不到北。作为中共党员，天天思考日日担心，我党执政还能维持多久？

苏联为什么垮掉？全世界都在研究分析，各类著作和大块文章俯拾皆是。现在人们比较共识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条：

第一条，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越过资本主义去搞社会主义，“超前共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第二条，苏联大半个世纪的统治，孽生出一个窃国掠民的权贵富豪群体。这个权贵富豪群体是寄生在权力腐败之上的，人民不需要包庇权贵富豪的政权，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苏联一夜之间就被推倒了。

毛泽东建国后的错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把中国的“追赶速度”搞成了“-”数。天天自己与自己比都是“伟大成就”，你前进别人也在前进，天天喊“超英赶美”，结果差距越拉越大。在“地球村”的竞赛场上，追赶速度是负数就意味着被淘汰。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大大地提高了，这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扭转方向“打左灯，向右拐”的结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有了正数的“追赶速度”。如果中国的综合国力（可以用人均 GDP 来衡量），设想每年向美国靠近 1%，这意味着 100 年以后，中国就全面超过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果真能够做到，尽管前路会有艰险和痛苦，只要我们的“追赶速度”是“+”数，振兴中华就有希望，我们就有理由拥护中共继续执政。

二、要保中共政权必须做好的两件事。

光靠“追赶速度”是“+”数，并不能保证中共长寿。要维护共产党的执政统治，必须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必须遵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学会搞资本主义。

应该严肃地指出，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刚刚建立，资本积累尚未完成，保障商品自由、公平竞争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我们现在正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什么是“中国特色”呢？

1. 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世界任何国家都长，烙印最深。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精华与糟粕并存，影响浓重深远。

2. 中国还很落后。中国的资本主义起步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 300 年。中国现在小农经济还占据大半

壁江山，工业化（社会性的大生产）的门槛还没有过。

因此，中国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仅不能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就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还要“照顾”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例如，城乡二元制、农村的包产到户、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等现在还不能取消，即使转型也不能太急太快。政治改革现在议论最多的是民主、自由、人权，还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政党轮替、一人一票直选等，很多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行的模式，道理一套一套地讲，有考虑过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人家至少落后 100 年，人均 GDP 只有美国 1/15 的现实吗？美国是个没有民族的移民国家，几乎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而毛泽东、共产党建立的新的中国却是几千年旧的中国的延续，两者的社会管治模式能一样吗？中共政权中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如果没有，那才是割断历史，脱离现实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就是西方“先进”生产关系的翻版，在中国行得通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原理上、大方向上努力学搞资本主义，但千万不能过急，否则我们又会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犯“急性幼稚病”。

江泽民提出“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句话是原理性的错误。试问，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在哪里？应该在美国而不在中国吧，你能代表得了吗？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 3%，3 个人种田供 97 个人吃还有大量出口，我国的农业人口是 65%，还要进口粮食，中国现实的生产力落后，你就不代表吗？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往无前的，不同水平的生产力都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理想的生产关系，就是对现实生产力发展“0”阻碍的生产关系，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由于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 100%符合客观规律，人的行为、政党政府的行为总会或多或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英明的领袖、好的政府就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少一点阻碍罢了。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类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而人类所能做的就是调整好生产关系，尽可能给生产力少一点阻碍而已。江泽民这句话，错就错在“先进”二字，应该改为适应“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两个字的差异，说明江泽民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把基本原理搞懂。现在很多“民主派”人士的“先进”主张，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超前、滞后都会破坏生产力，这条规律不管什么信仰，不管谁执政都不能违反，违反了就会祸国殃民。

第二件事，必须反对权贵资产阶级。

中国不搞资本主义就必定倒退，就必定会出现复辟封建主义的黑暗时期。我们确实存在着复辟封建主义的危险。毛泽东搞“文革”，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的就是“封建乌托邦”，毛泽东成了“皇上”，愚民们山呼“万岁”，各种封建落后的东西沉滓泛起，实质就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习惯势力“借左还魂”，向脆弱的资本主义进行扼杀和反扑。现在我们必须警惕权贵寻租、权贵世袭，中国已经孽生出来一个权贵富豪的群体，这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的毒瘤。毒瘤不除对中国、对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极大的危险。老百姓痛恨贪官污吏，更痛恨权贵富豪。反对权贵资产阶级，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件事搞不好，中共一定折寿，中国发展的进程又会出现曲折，人民又要吃大苦头了。关于中国权贵富豪的状况，辛子凌先生和很多学者已有详细的论述。我要补充的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道理讲清楚：

----权贵资产阶级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的各种弊端和权贵富豪的出现是由于改革开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形成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古今中外只要权力寻租，而又监管不力，就会产生腐败，就会出现权贵富豪，这种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奴隶社会的商纣，清朝的和珅，国民党的四大家族都是权贵富豪。相反，资本主义是一种契约经济，它的本质是要维护商品的自由竞争，它是反垄断、反世袭的。到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感到人家的政府比我们的政府清廉。资本主义上了轨道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香港，对治理贪腐是有成效的。为什么老百姓认为毛泽东时代贪腐比现在少呢？原因是开国之初，社会物质比较匮乏，权力寻租所带来的货币收益不大，当时虽有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但的确没有形成权贵富豪的群体。另外，开国的第一代、第二代权贵还没有忘记民间疾苦，还有自我抑制权力寻租的觉悟，很多老革命是能够做到洁身自

爱的。共产党就是靠廉洁得天下的，老百姓怀念过去是很正常的。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贪腐不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也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如果把现在社会上的弊端，不分青红皂白都归咎到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仅分不清是非，还会把反对权贵资产阶级的斗争引入歧途。

----反对权贵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我们反对权贵资产阶级不是笼统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也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自从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产品有了局部剩余，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对立的阶级。奴隶与奴隶主构成了奴隶社会，农民与地主构成了封建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里的对立阶级都是共生、共存、共亡的。奴隶社会不是被奴隶阶级打倒的，而是被先进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取代的，封建社会也不是被农民阶级打倒的，而是被先进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取代的。取代的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现有生产力下，要人为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了。中共“八大”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原理性的错误。那时的“三面红旗”，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直至今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充满着劳资矛盾，号称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却说资产阶级不存在了，真是天大笑话，贻笑后代。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就是剩余价值占有与被占有之争，这种斗争是推动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到产品极大丰富之日，这种斗争是不会停息的。从古到今世界各国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从本质上说都是规限剩余价值占有与被占有的“度”。好的政府就是规限、调控“适度”，如果调控“失度”，不论过左或过右都会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都会破坏生产力。

毛泽东、共产党打江山时提出的纲领是推翻“三座大山”，讲对了也做对了，所以夺得了政权。其中要打倒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要打倒资本主义，也不是要打倒整个资产阶级。建国后，毛泽东变了，他要打倒整个资产阶级，要消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说错了也做错了，中国人民就遭殃了。我们现在反对权贵资产阶级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切莫乱打一气，否则就会被复辟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所利用。只有把权贵资产阶级这个毒瘤切除了，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才能使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

----权贵资产阶级是祸国殃民的全民公敌。

权贵资产阶级是寄生在权力腐败之上的。不腐败的权力，不会产生权贵富豪。

我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保护“资产增值归投资者所有”这条法权的，因此资本营运（用钱生钱）也会产生富豪的。只要守法经营，获利致富是允许的，致富意味着经营成功，意味着创造的价值大，致富光荣。身处资本主义的民众，对像李嘉诚、比尔盖茨、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这样的富豪也没有什么“仇富”的心态，人们衡量的尺度是依法经营。

权贵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它仗仗的是权力寻租、权力世袭、违法乱纪、巧取豪夺才能聚敛财富。聚敛来的黑钱又通过腐败的权力把钱“洗白”，成了富豪，加入到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了资产阶级中的毒瘤。权贵资产阶级通过权力腐败、垄断经营、违法乱纪，疯狂吞噬着社会的财富，侵占损害的是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包括依法经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权贵富豪聚敛了财富之后，把家眷送到国外，把钱汇到国外以逃避打击和清算。所以权贵富豪是窃国、卖国的，是整个社会的公敌，是重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辛子陵先生的资料《两个曾伟》就是这样一批蛀虫的实例。当权贵富豪的人数增多到成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民怨鼎沸，无论谁执政都是垮台前的信号。苏联如此、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不例外。

三、联合起来反对权贵资产阶级。

我们现在反对权贵资产阶级与建国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性质是一样的，具有反封建的属性。反对权贵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保障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需要。真正的共产党应该领导人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倒窃国殃民的权贵资产阶级。

权贵腐败是可以遏制的，事在人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较少腐败就是证明。香港六、七十年代也

是腐败横行、官黑勾结的。当时有一个英国女人叫杜叶锡恩（现在九十多岁了），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搞了一个“廉政公署”直接对港督负责，反贪打黑，不到五年就把贪腐的歪风压下去了，直至现在香港的廉政都在有效运行。英国政府知道统治香港只剩下 30 多年的时间，尚且能下决心反腐，为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就做不到呢？我党不知发过多少文件、决议，高喊反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越反越贪（数额越来越大）、越反越腐（人数越来越多）呢？原因是权贵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反腐败之所以困难，因为复辟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以致朱镕基总理反腐也要不惜粉身碎骨闯地雷阵。

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提出反对权贵资产阶级，我是坚决支持的。但我在写本文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尚不敢承认中国存在资产阶级，又怎么会允许反对权贵资产阶级呢？难怪辛子陵发表《讲话》后会受到种种的限制。共产党员，摆事实讲道理要反对权贵腐败，却得不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支持，心能不痛吗？但我还是认为我党的健康力量在起主导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联合起来反对权贵资产阶级。

只要共产党铁腕反腐，就会万众归心，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执政统治的。如果任凭腐败的毒瘤演变成癌症，那就只有垮台重蹈苏联的覆辙了。共产党垮台都是自己打倒自己的。复辟封建主义是很可怕的，黎民百姓又要遭殃了。

2011 年 9 月 15 日 五柳村 2011 年 9 月 17 日收到 【转载自五柳村】

同学张鲁

孙丹年

1980 年，阎旭光同学在文学社里提出“普通人”概念。我的理解，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它的指向是要扭转当时普遍的、愚昧的偶像崇拜，以及盲目的奉献牺牲精神，转而提倡关注民生、关注每个人自身。它的来源，应该是西方民主主义与中国三民主义理念中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结合；它的现实意义，是释放每个普通人的能量，以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将近 20 年后，官方才提出了接近这个概念的“和谐社会”理念（这里仅指其社会理念而言，不包括其政治、经济理念及实践的情况）。

张鲁是当年“普通人”文学社的形象代表之一，后来师生们提到“普通人文学社”时往往提出张鲁。但理念不是生活，生活中的张鲁很难说是一个“普通人”。主要在于其心态，至少经常在我等同学们面前有意无意流露的优越感，使一般同学很难认同他是一个“普通人”（尽管他的身份始终贴近普通人）。我和他不多的交往，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当我们相对时，他往往“白眼望青天”，惜言如金。很多事情，他不明说，我不明白。

当年在西南师大的大礼堂，张鲁竞选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他在台上演讲，讲到精彩处，全场掌声雷动，我也使劲鼓掌。那天好象我是坐在下面第一或第二排，正中间，刚好在强光照射的范围内，他目光一扫，就看见了我。我捕捉到他目光中的一丝欣慰，分明为他自己的演讲被这么多同学所欢迎、所支持，而感到高兴。

至于张鲁当选学生会主席之后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一如既往地离他很远。关于他以及“他们那一伙”的高傲，同学中多有议论，例如端庄秀雅的一位淑女型同学，不经意间也冒出一句：“这些普通人，也太脱离群众了！”超拔于普通人之上的“普通人”们，给校园留下奇特的回忆。

竞选成功之后不久，张鲁叫我“一起去走一会儿”。我是很容易激动的人，装着满肚子问题和想法，找着合适的人就要絮叨一番。他提出“走一会儿”，我的理解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以学生会主席身份，他可能要向我了解些什么，也会乐意回答我的问题。我当然非常高兴。

我两个从小校门出来，经过文星湾，走过“穿洞”即隧道，到了会仙桥，再走上坡拐入蔡锷路，一直走到蔡锷路快要走完的地方，往右边一道石梯上行便到水岚垭，上面就是西师小校门了。好几里的路程，这一路上的情形可能有些滑稽：他抬起头，举着脸，目不斜视，一言不发；我在他旁边或后面紧跟，不时用眼角去瞄他的脸。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到了石梯前，他停住脚步，回头对我点点头，那点头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叫我“留步”。他笑了笑，仍然一个字都没有，朝着石梯扬长而去。我在原地愣了一阵，垂头丧气的。说实话很不舒服，有点鬼火冒，学生会主席是这样当的吗？我有义务陪着你走一会儿吗！

张鲁之难以理解，在于他不屑与芸芸众生为伍，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除非别有目的，总是懒得答话，懒得解释，以他之昭昭，使人之昏昏。

现在回想，我是有义务陪他走一会儿的，他不明说，我不明白而已。

是张鲁让我参加文学社的。最初的文学社叫“初民社”（不是后来的“普通人文学社”），经过如下：

1978年深秋，入校不久，第一次写作课，李淑清老师让大家写作文，相当于搞一次摸底考试。题目很偏，叫《新中国的儿童》，这使得多数男生抱怨不迭，而女同学则比较出彩。

我马上就想起了不久前在生产队当所谓的“幼儿园老师”，我所教养的那些3至6岁的孩子。我写了孩子们面带菜色、发育不良、衣不蔽体、蓬首垢面，写了所谓“幼儿园”没有任何设施，来“入园”即来到开社员大会的地方，也是生产队的临时粮仓，夏天堆着未晒干的包谷，冬天堆着刚出土的红苕。开大会时许多社员都习惯靠墙坐在地下，本来我也想让孩子们坐在地上，但他们多数穿的是叉叉裤而地面总有虫子在爬。我让孩子们坐在大人开会用的很窄、很粗糙的木凳上，这种凳子就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支架撑着一长块木条，孩子们的光脚板悬空吊着，离地面很远，导致其中一个向后仰天摔倒时，拉动一排孩子全部向后摔去，“哇哇”地哭成一片。

我旁边是杨爱林，她伸头来看我的作文，然后捂着嘴轻轻说：“你这样写，要遭！”我想一下回答说：“遭不到个啥子！”又一想，管他的，遭就遭吧。

下一节写作课，选出两篇范文来朗读，第一篇是正面描写幸福儿童的，红红的苹果似的小脸，洁净的衣衫，笑起来俩酒窝，什么什么的。第二篇就是我的作文，居然也成了范文。

1979年，大约在春夏之交，有一天在3129阶梯大教室上课，课间，姜力挺叫我出去。姜力挺和张鲁站在教室外面的杨树下，我走到他们面前，姜力挺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文学社？我不大懂，但是以前阅读过1950年代末期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一个长篇小说《大学春秋》，大致知道学生社团的概念，就说愿意参加。姜力挺叫我某天下午到办公大楼旁边的草坪上去开成立会。张鲁始终没有说话，我没有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只认为是姜力挺邀请我参加文学社的。

很久以后，我才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叫我参加文学社，很可能是那篇作文。如果是那篇作文，则只能是张鲁提议的，因为上写作课分小班，姜力挺是第一班，不跟我们一起。我和张鲁同为第二班，在同一间教室、由同一位老师上写作课。

到了预定时间，我去到办公大楼外面、凉亭旁边的草坪，有七个同学到场，张鲁、姜力挺是领头的，女同学只有我和李永英。张鲁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主要是姜力挺说话，他让大家首先为文学社起名字，并说张鲁先起了一个叫“初民社”。大家觉得不好，于是各自去想，写在纸条上，五花八门，我记得自己起了“小草社”和“春草社”，总之离不开“草”。弄了半天，所有人取的名字合起来，都不如“初民社”厚重、有文化韵味。我看看张鲁，他面无表情，我想他对这批“文友”一定非常失望。

之后让各人谈“创作计划”，这纯属瞎扯，在努力写好作文的阶段，哪里谈得上什么创作计划。李永英谈了一个写作构想，得到肯定，一致看好。下一次她朗读文稿，又一致失望，说“远没有你上次说的动人。”

然后就有同学对我们展开了胡乱的评价和攻击，以贬义词居多，也有客气点的叫我们为“初民七君子”。有个同学对我讲过一段情景，很能体现张鲁的性格：有个周末，几个男同学同乘公交车回重

庆，他们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张鲁则站在他们面前。由于入校不久，互相还不熟悉，这几位同学没有认出张鲁，他们就在张鲁鼻子下面，年少轻狂，口无遮拦，大肆抨击“初民社”，不乏揶揄挖苦嘲讽，可能有些话讲得很难听。但是张鲁一言不发，面不改色，连眼神都没有异常。后来互相认识了，张鲁依然没有任何情绪反应。这位同学由衷赞赏道：“真是太好的涵养！”

活动了几次后，“初民社”于无形中散伙。

此后我跟着杜显怡，和姜力挺、杨政、阎旭光、彭光芒、吴廷正等经常聚集在王康的小屋里，张鲁更像是小屋的半个主人。这时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王康小屋里的聚会成为后来“普通人文学社”的基础。不过当时经常出入王康小屋的一些人，到1980年“普通人文学社”正式成立时，却缺席了。

也就是在西师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我响应刚刚成立的“普通人文学社”号召，为一种大字报式的宣传方式“课间文学”（具体经办者是杨政、张育仁、彭光芒、陈敏等）投了一篇微型小说，标题为《大会开始之前》，按照要求不超过一千字，整篇都是情绪发泄，感情极其浓烈，很适合当时爆炸性的校园氛围。中文系77级一个男同学（好象是陈敏，记不准确了）用毛笔将这篇微型小说抄写在一整张白纸上，和其他许多宣传品一起，用绳子挂在第一教学楼前面的大道边上。这个男同学还高兴地对我说：“抄完了我数字数，连标点，刚好999字！”

而“普通人文学社”的正式“社员”们，被打入另册，到毕业时全部都要作检讨，否则不发给毕业证。根据不同的级别在不同的场合作检讨，王康和杜显怡在校领导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展开争论”，老朽的领导同志决不是锐气十足的青年精英的对手。不知道张鲁在哪里作的检讨，想来应该也是在校长办公室里，我猜想以他的口才，不消三言两语就将领导同志们搞定了。

我在小组会作检讨，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中文系78级二班第四组，七男三女共十人，本来我是组长，我提出不干了，由靳猛进继任组长，这场检讨会是靳猛进主持的。小组会在新宿舍大楼的男生寝室里召开（从进校第一次小组会开始，几乎都是在男生寝室里开会），大家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明白一个坚定的原则是“决不认错”。但是不认错怎么过关？同学们大多满脸茫然，气氛有些尴尬，他们不同程度都支持民主运动，我即使要发难也没有对象，我们都“是一头的”。

我支支唔唔，辞不达意，没有说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最后有人（好象是杨隽）提出一个中性词汇“幼稚”解围，原话为“孙丹年在政治上实在太幼稚了！”其他同学都紧跟着说：“确实是、真的是、就是、太幼稚了！”大家不约而同去看班长史锦杰，小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最年长而且性格温厚的“史大哥”，他肯定不会为难我。于是过关，散会，之后顺利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同学在毕业分配上多少都受到影响，但所有77级、78级同学全都领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因为“法不治众”，校方没敢实施惩治。从79级开始出现被扣发证件的毕业生。双证不齐全将影响到毕业分配，一个奔赴西藏的中文系79级男同学便因缺少学位证而严重影响到终生的命运走向。

现在我还记得小组同学们善良忠厚的表情。张鲁竞选学生会主席，我们小组的多数同学是投了赞成票的，他们也投票给竞选北碚区人大代表的同学。正是多数朴实正直、明辨是非、具有强烈民主诉求的同学，构成了1980年高校学生民主选举运动的基础，成为少数冲锋在前的精英同学的坚实后盾，这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许多高校中被公开选举为基层人大代表的学生们（我估计至少以二位数计算），以及更多高校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学生会干部。以促进时代发展的进步意义衡量，团结在民主先锋周围的同学们，都当之无愧为一个曾经的专用名词“进步青年”。

当然，选民们也充分正当地希望，由自己推选的人民代表和学生会主席，能够关注、尊重和满足自己最急迫的诉求。而且，民主选举本来就是从民众需要出发、以最终满足民众需要为目的的。按照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关于“民权主义”的论述，现代民主政治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如果获选者不能按照民意行政，选民可以提出弹劾和罢免，因此获选者决不是高枕无忧的。在高傲的精神贵族

和运动民众的政治领袖之间，张鲁所面对的是鱼与熊掌。

能够参加文学社活动，我真的非常感谢张鲁，是他让我进入了新启蒙时期最富于精神营养的平台，得到蒙养与启迪。在王康的小屋里（也有时在户外，或在缙云山上），我们定期举行一些活动，有一次张鲁宣读他对日本电影《生死恋》的影评，写得真好，大家都很激动，我全文照抄下来，保存至今。有一次是王康提议的，讨论小说《戴黑面纱的女人》，涉及很深刻的哲理。还有一次姜力挺提出“文学中的非英雄化倾向”——他经常石破天惊的，有一次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弱小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才不需要经常叫唤着爱国爱国”，由于不很懂他在说什么，这些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大家互相“背靠背”写评语，然后当众宣读并传看，让每个人明白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印象。

我曾和杨政、杜显怡在一起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得失，明确无误地得出了“国际共运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一定会失败”的结论。所以，当11年后，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时，许多人惊诧莫名，我却一点没有惊讶，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次，是每个人朗读自己的一篇作品，然后无记名投票选出一、二、三等奖，我呈上的是我当知青时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事实挺令人震撼，感情很饱满，笔调又特别朴实，得票最高，获得一等奖，得到一份奖品，是一个比巴掌还小的红皮笔记本。姜力挺在笔记本上写下典型的“诗的语言”，其崇高的比喻令我汗颜：

如果有幸能塑一尊雕像，
我将用汗滴混合着泥土……

作品《小组通讯》竞赛 第一名

二零，四，廿五

此后，这个本子随我走南闯北，保留至今。有了这份奖品，我终身不再期盼、也不再需要另外的文学奖。

很久以后，我大致明白了为什么张鲁要叫我陪他“走一会儿”，他把我当作民主运动中精神上的朋友，也许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不需要语言的，不过他没有想到以我之愚钝，不可能体察理解他的贵族式心思。这是另一位同学告诉我的，他说，张鲁对他讲：“在西师中文系的女同学中，参加民主运动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个人就是孙丹年。”

也许张鲁这样说有些绝对，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否应该“坚持到底”，他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自己肯定属于能够坚持到底的那种人。为了这句“知音”，我感谢他一辈子。感谢归感谢，但我还是不能认同一个跟我一起走了半小时以上、却始终抬着头、举着脸、一言不发的民选学生会主席。

还有一件事，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我想创作一个以精神病人为题材的剧本，听说张鲁的女朋友钱红是重医的学生（我们没有见过面），就请张鲁转达，请她代为提供一些关于精神病人的素材。想到张鲁处处高人一等，他未必真的肯帮忙，也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不久张鲁就把钱红抄写的资料交给我了，那是很娟秀的一笔小字，密密地排列在好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拿着这几页纸，我半天没动，心里很感慨，想象不出钱红是怎样一位美丽清纯、心地高尚、教养良好的女孩子。

从西师毕业后我到了西藏。他到西藏拍摄电视剧《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找我帮忙选演员。我任教的自治区艺术学校，舞蹈班、藏戏班里有很漂亮的女学生，可惜这些孩子都不懂影视表演，最后一个也没有选上。和张鲁一起来的，有重庆电视台的何为、潘小杨等。潘小杨进艺术学校大门时，门卫叫他填写会客单，其中一栏为“会见目的”，潘小杨填写的是“畅谈革命理想”。

张鲁和他的朋友来到艺术学校，我们正谈得高兴，我当时的丈夫突然回来了。他是很朴实的人，见家里来了朋友，表现很热情，但是张鲁连点头招呼都没有，突然间就起身走掉了，让我有一点难堪。他是否因为不喜欢我这位前夫才突然走了的？又觉得不至于。不过确实很无礼貌。

其实我的前夫是个很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当他还在海南岛念本科时，就和同学计划着将来要到北京农大（现在的中国农大）去设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实验室。现在，中国农大植保学院的确有了一个以

他那位同学的名字命名的植物病毒实验室。两个从福建山区蹦出来的穷小子，除了学业优秀，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和根基，他们的学科志向，绝非今天很多以谋取饭碗为目的的大学生所能比。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很伟大，无非做了份内之事，心态尤其普通，是货真价实的“普通人”。

张鲁曾打算将我的作品搬上荧屏。好象是在 1984 年，我从拉萨回家休假，他和钱红一起到北碚来找我，适逢我外出，他留了一张条子，其中一句是“想兄外出云游去了”，文绉绉的，我整日为稻粱谋，哪有什么“云游”的雅趣和境界。当时我的母亲正在主持小学里的教改实验班，有声有色还非常有趣，我根据母亲的课堂实践创作出一些小故事，张鲁提出将其中一段改编成电视剧，我却不明白奥妙，也没有什么事业上的雄心，没有积极响应，不了了之。

1984 年我到张鲁家去过，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和钱红婚后住在枣子岚垭（或者是红球坝，也许沙坪坝，记不准了）的一个很窄小的平房（或是平层）里，我在那屋里都转不开身。他和钱红心情愉悦，互相开着玩笑逗着嘴，钱红还伏在床上做了一个抬腿练功的动作（因为房间太窄，她本来就呆在床上）。我带着一部新买的海鸥牌照相机，提议合影留念，他说把王康叫来一起照。很快王康来了，大约那也是王康一生中很幸福的一段时光。我按动相机的“自拍”，技术很糟糕，焦距没有对准，但每个人都很愉快。

再后来，张鲁坐在轮椅上了。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其中从拉萨回到重庆后的第一次最令人心痛，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困顿和无奈。我是傍晚时分去的，他面容开朗，神情自若，有说有笑的，精神状态绝对比我优越，与我们在西师相处时的情景完全一致。坐不多时到了晚饭时间，负责照顾他的农村小伙子小潘端来晚饭，我只看见一个菜（因为马上起身告辞了），胡萝卜切成段炒蒜苗，刀法很差劲，最大的一段胡萝卜横亘在钵子中间，看上去既粗又硬，没有煮软，肯定也没有入味。这么粗砺的食物，与他刚才的满脸笑容、侃侃而谈和不容置疑的自信，产生了很大落差。他肯定不习惯也不应该吃这样的食物，我感到他笑容后面隐藏着不能言说的悲苦。一方面精神力量确实强大，能够战胜不幸，另一方面他在硬撑着，以免失却尊严。我突然觉得很心痛。

生活中的张鲁，在普通人面前，他很难降低身段、放下架子。后来我想，他是不是在极力撑持着尊严，并且掩饰着弱点？

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有帮助别人的空间，至少他曾经有过帮助我的表示。我刚从拉萨回重庆时，他两次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你想去哪个单位嘛？”“你想去的那个单位，去成了没有嘛？”现在回想，似乎在暗示，也许他能帮助我落实工作单位，以解救我于焦头烂额之中？当时我决定要去的单位，从工作内容来说极其适合我、从工作关系来说极其不适合我，几年后被迫离开了。其实当时应该请教他的，他肯定看得很明白。但是他不明说，我不明白。

有一天我去看他，目的是有个记者想采访他（忘了是谁），请我先征求张鲁的意见。张鲁先是拒绝了，然后说：“与其来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你来写！”于是我写了《如果生命出现塌方》，描述了他车祸致残后，最初一段生不如死、生死挣扎、灵魂浴火、奇迹复苏的经过，发表在 1991 年拉萨的《主人》杂志上。

回忆有两次去看望他，一次是春天，带了一把很新鲜的刚从歌乐山上采摘的芦苇，故意把苇秆留得很长，比人还高，一路在公交车上小心护着，怕挤折了。到了他家，他正坐在阳台东头写作，很专心的样子。我隔着护栏把芦苇递给他，因为很大一把，又粗又长，他欠起身子才接过去。我顿时觉得这么大一把不合适，就像一个习惯了佩戴小手枪的人，突然塞给他一挺重机枪，扛着也不是抱着也不是。于是下一次去时（已经过了好几年），我采了一小把野花，紫兰色小花为主，配了好几种颜色。但是到了他家，叫了半天没有答应。这下我又不明白了，是他突然被人接走了不在家？是出现了什么身体问题不方便接见？还是根本不愿意见我？如果是后两种，完全可以在预约电话中说清楚。我满心疑惑，把野花放在他门口的护栏内，走了。

之后就是为纪念毕业 20 周年在成都举办 78 级二班同学会，在重庆的二班同学预先开了个筹备会。筹备会地点在沙坪坝名人广场某餐馆（离张鲁住处很近），由裴书节作东，熊伟、徐璿嘉、李秉鉴等

到场。那天张鲁坐着轮椅由王康推着来了，王康说张鲁也打算到成都去参加同学会，令大家都很振奋，猜想可能是他的腿出现转机了，有站立起来的希望了，都非常高兴。席间，张鲁还喝了啤酒。大家都不注意时，他叫着我的名字，举一下杯，我机械地回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回想，这举杯是为了那把小野花吗？他不明说，我不明白。

但是不一会儿张鲁就不行了，我们并没有看出来他发生了什么，只见王康很紧张地就要推张鲁离开，张鲁面无表情，直视前方，眼神委顿。熊伟赶紧去帮忙，被王康粗暴地挡开，说“你不晓得！”

大家送他们进了电梯，回来后面面相觑，兴致全无。不一会儿王康也回来了，他情绪逆转，烦恼至极，向着空气大骂。于是整体闷闷不乐。

当然成都的聚会张鲁没有去，王康说他浮肿了，还有什么别的并发症。也许喝了那点啤酒？脆弱如此，哪里可能与健康人一样！

再见到他，就是在他作报告的市委小礼堂的现场。单位组织我们去听讲，预先并不知道谁讲、讲什么内容，座位也是预先发的票，我又坐在前面，面对舞台的左侧，好象是第二或第三排，在强光照射的范围内（之所以坐在前面，是因为按照惯例正中第5至8排要留给领导同志，我的单位人少，正好填前面的空）。张鲁坐在轮椅上被推到舞台中央，电视台的化妆水平就是高，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表情很阳光，跟普通人无异。给我的错觉，他就是与健康人一样，甚至更好，因为他的精神力量尤其强大，而且现在一定有条件服用最好的药物，相当于峨嵋仙草，起死回生，返老还童。

这天，张鲁讲述自己如何作为领军人物，率领着一群“义务工作者”，克服一切困难，到偏远贫困山区去拯救失学孩子。他们制作的专题片感人至深，他们的业绩得到各方面肯定，尤其得到上级欣赏。这场面与20多年前的竞选演说何其相似，依然是他在台上演讲，我在台下鼓掌，场内依然热情涌动，掌声如雷。

但对我来说，此次远不是彼次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教育改革的黄金时期，各种流派的教育家非常活跃，而且总体理念正确，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实践。如果按照那个时期的教育改革路子走下去，中国教育绝不致陷入今天的困局。在那个时代，有好些提出过民权、民生相关主张的伟大先驱者、启蒙者，他们不但提出主张，也尽力从自身做起来实践这个主张，例如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宗旨独立于政府之外，教育主张与政治主张相伴相成，伟大隐藏在平易之中。

要拯救中国教育，远不是发展慈善事业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就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如果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尤其将这个主张通过媒体向全民提出号召，必将误入歧途。

我想，对于这一点，张鲁自己非常明白。在市委小礼堂作报告时，他习惯性地眼光一扫，又看见了我，不过这次绝不是20多年前竞选学生会主席时候的那种欣慰眼光了，这次他的眼光里含有一丝畏避。我清清楚楚听得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在这里来作这个报告，我感到很惶恐……”而20多年前他一点也不惶恐，那时，他要说的话是坚决而有力的，指向是清楚明白的，锋芒毕露，充满青春的勇气。不过20多年前他作报告是一次性的，而现在的报告却多次复制，越作越远，一直作到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间。

我不知道那天他在台上惶恐的是什么。以我之愚钝，倒是发生了这样的疑惑：教育慈善在中国当今教育改革体系中，定位模糊；他在市委小礼堂这个权力中心来作报告，有可能是被权力所利用；事实上他是在自我表扬，更进一步为媒体张目；而媒体可以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拯救失学儿童的道德制高点下面，深层道德是否同样纯粹……当然，这只是我的疑问。

张鲁努力的拯救失学孩子的事业，虽然意义重大，但是以他的认识深度、社会地位、运作能力和影响范围，原本可以将矛头对准更深刻、更尖锐的社会内容——只有制度保障才是最可靠的保障，教育改革必须从制度改革着眼，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

时光流转，青春消磨，锐气钝化，在思想传播领域，张鲁撤退到安全地带。社会思潮已经潮头低

落，转入平庸，陷入琐碎，张鲁的情况又极为特殊，他尽全力挣扎着才得以延续的生命是那么艰难，把如此艰难的生命奉献给贫困失学孩子，人人对他都只能仰视。

不过，正是这时，我发生了错觉，认为他享有最好的疗养条件，有可能经常服用长生不老之药，仙气飘飘，完全不类于常人。所以，当同学电话告诉我“张鲁去世了”时，开始我没有反应，之后觉得肯定是对方说错了，或我听错了。

参加过追悼会、追思会，夜深人静时，打算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起关于他的一切，忽然间便悲从中来，痛彻心髓。

人孰无过，谁没有缺点弱点，能够正视并承认自己缺点弱点的人，能够因为有缺点弱点而接受批评的人，就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真正的普通人同学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当面批评张鲁。但是今天，在送走张鲁以后，我突然觉得，如果当年能够大胆地想说就说，对他当面批评，如果当时他能够接受批评，就算暂时中断友谊也不可惜，因为，也许能够使他存活得长久一点。

痛定思痛，忍不住发出迟到的如下诘问——

张鲁，你不要总是端着个架子好不好？不要总是让别人以为你是神仙，好不好？

你跟普通人一样好不好？有委屈就倾诉，有烦恼就表达，有误会就解释，有愤怒就大骂，有欢乐就分享，有伤痛就呻吟，饿了吃，冷了穿，累了就歇着，血压升高就躺下。你不要掩饰自己的伤病，痛楚时不要硬装作舒坦，窘迫时不要遮掩困境，千万不要硬撑，一切符合人性，这才是普通人啊，好不好？

你在身体出现危机时，并未关爱自身生命；你在人生即将结束时，并未关爱自己从而关注亲人朋友的感受；总是掩饰病痛，保持高屋建瓴的微笑，像神仙一样高坐云端，将自己与友朋隔离。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王阳明先生说：“身在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民间有老人互相祝寿的俗语：“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寿为八十八岁，加上草头“艹”为茶寿，一百零八岁。你多活 30 年，能够多做数不清的好事；我们大家都多活 30 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重聚在耄耋皓首，好不好？

不要你突然就走了，让我们如此心痛，好不好！

落笔至此，心一直在痛，很痛。

2011-6-20 7-28 修改 8-24 改定 【交流文稿】

军代表想为我这“右派”翻案

王开泰

按：本刊第 7 期发表了林定恕的《军代表支持我翻“右派”冤案》一文，其实，因“右派”这样的冤案实在是太不合常理，所以在文革大动乱中愿意支持“右派”翻案的军代表并非罕见，王开泰此文便又给我们介绍了生动的一例，而且这个军代表的“翻案”工作做得更为深入细致，令人敬佩。

运动初期到处张贴着中央（67）325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在运动初期，揭发“当权派”时，各地区有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权派”迫害的人要求平反。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我想，一旦运动后期有机会，我要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

1969 年 8 月，解放军 204 部队进驻我校，军代表叫郭东明，是一名团级干部。通过几次接触，我发现郭东明同志政策水平高。首先，他冲破重重阻力，在 10 月 27 日果断宣布解散“牛鬼”队，对在

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干部大胆解放，把长期复杂的混乱局面理顺了。

我想，他本人并不涉及我单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处在比较客观的角度上，应该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我的这个“历史问题”。我想向他透露一下我的冤案，即使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至少他不会迫害我吧。于是我决定冒险一试。

管理我们“牛鬼”队的学生杨柱君向军代表汇报“牛鬼”队的情况时，他着重向郭东明介绍说：“‘牛鬼’中有一个叫王开泰的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时才17岁，在军队中曾为营级干部，师参谋等职，在战争年代中负伤残废，后转业到五一校，因与崔振杰有矛盾，被打成‘右派’。”郭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被打成‘右派’呢？”杨回答说：“听说他想争夺崔振杰的校长位置，后被崔整了。”

11月5日，郭主任找我去谈话。我鼓起勇气把我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全部向他倾诉。他边听边作记录，并不时插问我一些情况。我再三强调，我这个案子的假相很容易识破，崔最恶毒的手段是制造了一个假的“阶级背景”，说我是大地主、大汉奸的儿子，是被八路军俘虏过来混进革命队伍内部，对党有刻骨铭心阶级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他把我给他提的意见统统归到“对党有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这条“钢鞭”上，置我于死地。

我引用毛主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几条语录，要求军代表甄别此案，并当场表示如果我欺骗了党组织，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最后我拿出了我保存多年的几份材料给郭主任。

郭东明感到很震惊，他立即向我表示三点：一、他要先看看我的档案材料再说；二、叫我立即写个全部详细的材料交给他；三、为了把问题尽快搞清楚，叫我本人主动协助组织。

他说：“你给你父亲写封信，叫他把你们家庭情况，你父亲本人的政历以及现在的情况写封信向你介绍一下。另外，以相同的方式写封信给你的三叔，叫他如实把45年你参军前跟着他的那段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这两封信的回信来了后，你把它交给我，然后再考虑下一步党组织派人或发调查函的问题。”

他还说：“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先弄清楚‘阶级仇恨’的问题，只要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是正常的内部矛盾，顶多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他还嘱咐我，在问题未弄清楚前，不要对外谈，这个事情只有他一人知道。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12年后，第一次大胆地倾吐我的冤案，多年来我被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整怕了，我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疑问，我自己都不大敢相信，我真的遇到了一位敢于面对事实真相的共产党人？

这次谈话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详细的申诉材料交给郭主任，并先后发出两封家信。

1970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到父亲和三叔的回信，详细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其中三叔王克宽的来信中，除了详细介绍了我参加八路军前的那段历史外，并提供了另外一名证明人乔季铭（当时任三叔所在部队的营长）。我立即把这两封信交给了郭东明。

郭东明看了我的全部档案材料后，又找我谈了两次话，并要求我又写了一个补充材料。

1970年7月2日，郭东明在第三次找我谈话时说，这个案子是个历史错案，但是，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崔给此案定性之前，按组织程序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了。如果是崔以单位党组织的名义搞的，我们就可以立即纠正此案。郭东明说，他们打算请示一下上级，作为“支左”部队发现了历史错案，该怎么办？他还说：“我看了这个材料后，感到这个人（指崔振杰）的手很毒辣。”

郭的谈话十分真诚，从这里可以看出崔振杰不但心狠手辣，而且手段高明，他先把我的案件报请上级批准，使其“合法化”了才下的手。

在这之前，有人向我透露，在收发室见到一封外调密件，封面上写有从山东省高密县发出。那十有八、九是有关此案的外调材料，看来军代表认为此案是个错案，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1971年元月10日，郭东明第四次找我谈话。他说，此案他已经请示了唐政委（当时“支左”片

区的领导人，老红军），唐的指示是：案情性质不同一般，涉及到给“右派”翻案的问题，即使明知是个错案也要慎重，否则有人会说我们军队给“右派”翻案，为了慎重起见，根据中共中央（67）325号文件精神，不准给“右派”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等等看，中央对这类情况有何指示，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后来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那个所谓“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我又被愚弄了。

1972年底，崔振杰已“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官复原职，“支左”部队准备撤离学校。郭东明担心留下这些材料，以后会给崔振杰作为打击报复我的依据，便悄悄把我交给他的所有材料带回部队他家里，然后让我到他家里去取回来。郭的此举我深受感动，在那个年代我的“右派”冤案虽无人敢动，但从郭东明身上代表了一些共产党员的良心！

军代表和他的上级不敢动我的案子，我完全理解，我敬佩他们的良知。看来只有等毛泽东这位“一贯英明正确”的“万岁”死了后，冤案才能平反昭雪。

郭回到部队后，我常去他家做客。有一次聊天时，我听他说部队的一号首长名叫李志武，我立即激动起来，李志武是我的老战友，1948年我和他一起在二野后勤司令部当参谋，而此时他已是正师级干部了，郭是他的政治部主任。

当郭知道我和李首长的关系后，立即要带我去见他，我这种身份，有何脸面去见老战友啊！我以时间已晚推辞了。

过了不久，李志武得知我的消息后，突然来我家看望我。以后每当我去他们部队玩时，李志武和郭东明都把我作为座上客，好酒好菜热情招待我，李志武对我的冤案极为不平，他曾打算通过渠道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反映我的冤案，请他出面为我平反，可惜他的努力未成功，后来他就调走了（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当右派22年》。现题目是本刊另拟的。）【交流文稿】

我的两位右派老师

佚名

去年6月份，我在成都会见了分别五十多年的一位小学老师王必峦。

那天，我和我老伴，从成都西三环打的，穿城而过，来到东二环二段的SM广场。这是我和王老师事先电话约好的会面地方。到了广场上，我又用手机向王老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到达约定地点，只一会功夫，就见一位老人，从街对面沿着一道斑马线，迈着隐健的步伐向广场走了过来。凭直觉，我立刻断定，这位老人就是我五十多年没有见面的王老师。

我大步迎上前去，把这位我五十年前的小学老师扶了过来。我让他在广场边的一个石凳上坐下，我们相互打量着，都显得很激动。如烟的往事，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1957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大灾大难之年。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变，坠入苦难的深渊。受难者在无边的苦海中拼命挣扎，一些人溺死在苦海中，永远地消失了。一些人受尽煎熬，最终从苦海中游上岸来，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八十多岁的王老师大难不死，算是这样的一位幸运者。

1957年，我只有13岁，正在故乡四川渠县丰乐乡——大巴山下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小乡场上上小学。那年暑假后，秋季又开学了。我背着书包和村子里的一些小伙伴一同上学去。我们的村子离乡场大约一里路，翻过一面缓缓的斜坡，就进了街道。再沿着这条狭窄的独街，走到街道的另一头，就是我们的学校。这是一个从前的庙宇改建而成的学校。是我们这个乡当时的最高学府——丰乐乡完小。

那天，我和小伙伴们刚走到街道的拐弯处，突然听到一阵铜锣声“当当当”地响了起来，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耍猴戏的又来了，猛抬头一看，就见有十多个人，排成纵队从街那边迎面走了过来，为首一人戴副眼镜，手里提面铜锣不停地敲打着。这不是教我们班语文课的谢光吾老师吗？紧跟在谢光吾老师身后的就是王必峦老师。他们是要干嘛？要在大街上表演节目吗？但又明显不像是演什么节目，因为跟在他们这队人身后，还有几个乡政府的干部，还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接下来，民兵们命令这排着纵队的十多个人当街站着，他们从附近的茶馆里端出几条长板凳，让这十几个人依次站上去。于是很快就聚了一大帮看热闹的人，把站在条凳上的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后来人越来越多，竟把狭窄的街道都阻断了。于是又一阵铜锣响后，站在条凳上的十几个人，依次大声喊叫起来。第一个喊叫的人自然是谢光吾老师，他用比给我们上语文课时更加宏亮的声音，对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叫道：“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谢光吾。”接下来就是站第二位的王必峦老师，他在对着人群喊叫：“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必峦。”时声音却比谢老师的低得多，以致让站在下面的乡干部和民兵，又厉声喝令他重喊一遍，王老师于是又重喊了一遍，声音只略微提高了一点，顶多增加了半分贝。站在条凳上的十几个人都依次喊叫了一遍。条凳上的人中大约有一半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一半是我们这条街上医院的医生、信用社的会计和其它行业的人，我平时似乎都见过，很面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自报家门的身份，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后来我们到了学校，学校又在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让这些右派老师在大会上站成一排面对全校学生集体亮相。由校长当着全校学生的面，一个个指名道姓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地批判了他们的反党罪行。当五短身材，威风八面的校长抬起他那条短而粗的胳膊，指着王必峦老师的鼻子揭露批判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行时，王老师突然面对台下数百名学生大叫起来：“同学们，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对的是他王校长独断专横，我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他王校长报复打击我。我是冤枉的。”台下的学生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这时台上的王校长，却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一个右派还想翻天。”他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老师，立刻就有两名身强体壮的体育老师走上台来，把王老师的头强行摁下，王老师仍然大叫着：“你王校长报复打击，整人害人，伤天害理，不得好死。”两个体育老师一边一个，扭着王老师的胳膊，硬把他拖下台去了。

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恐怕给台下数百名学生的心里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我还小，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大人们说，所谓右派份子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份子，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向党和各级领导人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而右派份子就是阶级敌人，和地、富、反、坏一样，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那年，我们学校打成右派份子的那些教师，后来都不让他们教学了，让他们给学校打扫厕所，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而且随时还要被拉到大会上去批斗。再后来，这些右派老师都被一个个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有的还被判了刑送进了劳改队。

王必峦老师这样倔强的性格，自然遭遇更糟糕。他系当过兵的军人出身，性格刚正直爽，后来转业到教育战线，当一名小学老师，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没有直接教过我的什么课程，但每年学校要组织学生排演节目，搞业余宣传演出，都是由王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指导我们排练各种小型的文艺节目。王老师多才多艺，不但会演奏各种乐器，还能自己编一些像快板、舞蹈、幽默小品等文艺节目。他本来是学校的总务主任，是负责搞后勤工作的，而学校排文艺节目却年年都是由他负责，他凭借他的才干和勤奋，把学校的文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每年都获得乡、区乃至县上的好评。我当年喜欢唱歌跳舞，活泼好动，学校每年都把我选到文艺宣传队去，因而我从小几乎就受到王老师的言传身教和熏陶，对王老师很敬重。而王老师也很喜欢我，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师生关系。

王老师打成右派后，一直不服。说他跟本没有什么反党言论，完全是王校长罗织罪名，报复构陷而成的。因此他是最早一个被赶回农村劳动改造的。

而我们学校的那个王校长，叫王德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当年他是党员，很会吹牛拍马，曾

担任过公社党委委员，评为教育战线上的省劳模。一时红得发紫。此人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曾把学校一名高年级未成年女学生奸污，使其怀孕。为了推脱罪责，他竟教唆那位女生，诬告一名刚从师范毕业不久，担任女生班主任的年青教师。致使那位青年教师，有口难辨，被无辜判刑劳改多年。后来，这位王校长又继续和这位女生发生性关系，使其第二次受孕。终于露出了马脚，真象暴露，这位胡作非为，红极一时的王校长终于也受到处罚：开除党籍，罢免校长职务，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去了。听王必峦老师说，二十多年前这个当年不可一世的王校长就在贫病中死去，这也真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谚了。

我和王必峦老师见面后，他一定要邀请我去他家作客，盛情难却，我和老伴只好一同到他附近的家中去，见到了王老师八十多岁的妻子，两个十一二岁正上小学的外孙，和他的一位当教师的女儿。在他家我和这位分别五十多年的我儿时的小学老师促膝长谈，他向我讲述了他被打成右派后经历的苦难遭遇。

在生产队当农民生活是艰辛的，川东北丘陵地带，体力劳动繁重，爬坡上坎，肩挑背磨，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半饥半饱度日月。生活上的穷苦还可以忍受，但毛时代的极左统治，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喊叫得震天响。每一个运动一来，他都要当作死老虎，活靶子，和大队的地、富、反、坏、右一起，拉到台上去批斗。特别是文革十年更受尽磨难。讲到此他老伴告诉我说，每一次拉出去批斗，都是被整得死去活来，文革武斗时，一造反组织想要置他于死地，头天晚上几个造反派头目密商，第二天开批判大会要拉王老师去批斗，批斗完要当场抽掉他的脚筋。幸好有一个好心人，当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当天晚上正下大雨，王老师冒雨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连夜逃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躲了起来，才死里逃生，躲过一场劫难。

谈话中，我向他打听起谢光吾老师的事，王老师告诉我说，谢老师的遭遇比他更惨。在他被赶到农村去之后，谢老师不久也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生产队把最苦最累的活都派给他干，谢老师体质单薄，只能咬牙忍受。后来生产队派他外出牧鸭，那更是个苦差事，牧鸭就像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迁徙。几个人住在竹蓬里，得天天搬家。成天扛着根吆鸭儿的竹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都要把裤腿卷得老高，腰里系根稻草绳，赶着鸭群在稻田中放牧。几个月不得回家。三年大饥荒时，他的一些亲人在饥荒中饿死了。谢老师饿得不行，到地里挖了个生红薯吃，生产队长就向上报告他偷集体粮食，公安部门就把他抓起来，判了他徒刑，送进劳改队劳改去了。直到文革结束，平反冤假借案时，才把他从劳改队放出来，分配他到本县三汇中学教书去了。

谢老师的爱人张淑慎，也是丰乐乡的一位小学教员，谢老师打成右派后，上级领导要她和谢光吾老师划清界线，强迫她和谢老师离婚，搞得谢老师家破人亡。

平反后谢老师恢复了工作，张淑慎老师得以和他破镜重圆。两人没有子女，现已到耄耋之年，退休后住在渠县县城一座公寓里，现在仍孤苦寂寞地活在此世。

我真想去拜访一下这位教过我小学语文的优秀教师，但因带着家小诸多不便，只好作罢。现在把他的遭遇写出来，作为对这位老师的怀念和感激。

我和王老师告别时，八十多岁的王老师尽管头脑有点迟钝了，但思维仍很清晰，他明白地告诉我说，这一切苦难的根源，都是极左路线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造成的。 【交流文稿】